

《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

题目：父母关爱对农村留守儿童抑郁的影响机制：追踪研究

作者：范兴华 方晓义 黄月胜 陈锋菊 余思

第一轮

审稿人1意见：

意见1：本文提及“素质压力理论”并对其进行解释，却没有将留守儿童的问题直接与压力事件和易感素质直接建立联系，需要进一步阐述。而且相关变量之间的联系逻辑表述不清楚。

回应：针对该问题做了三方面工作：一是对素质压力理论原文进行了反复阅读，并对该理论关于压力与素质如何影响抑郁进行了更加清晰的阐述；二是广泛阅读了留守儿童文献，将留守儿童的抑郁情绪与缺少父母关爱这一生活压力以及低自尊、神经质人格、低社会支持等易感素质直接建立起了联系；三是根据素质压力理论框架，将问题提出部分为五部分呈现（1.1 父母关爱缺失与留守儿童抑郁情绪；1.2 自尊、神经质人格在父母关爱缺失与留守儿童抑郁间的中介作用；1.3 自尊、神经质人格在父母关爱缺失与留守儿童抑郁间的调节作用；1.4 友谊质量对父母关爱缺失与留守儿童抑郁、自尊、神经质关系的调节作用；1.5 性别与抑郁的关系），并在上述论述中，对变量间的关系增加了一些论证，使得文章的思路及表述更加清楚。具体修改的段落如下：

（1）针对压力素质理论以及“留守儿童的问题与压力事件和易感素质直接建立联系”问题的修改

抑郁作为儿童心理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是一种感到无力应对外界压力而产生的消极情绪(张文新,2002)。研究发现，留守儿童的抑郁得分（侯珂,刘艳,屈智勇,蒋索,2014; Liu, Li, Chen, & Qu, 2015; 严虎, 陈晋东, 2013）与抑郁症发生率（Cheng & Sun, 2015; Guo, Ren, Wang, Qu, Zhou, Ran, et al., 2015）均显著高于非留守儿童。留守儿童较高的抑郁水平是如何产生的？抑郁的素质压力理论(diathesis-stress theory) (Monroe, & Simons, 1991)认为，抑郁发生受到压力和素质的共同影响，两者缺一不可。其中，压力既包括重大生活事件、生活情境中的大量不利变化，也包括不利的早期发展经历,如童年期遭受的虐待、冷漠的抚养、同伴侵害等；素质(diathesis)又称易感素质，指易患抑郁的个体特征，包括各种生物易感素质和心理易感素质（如人格）。压力与素质对抑郁的共同影响机制如下：一方面，压力激发了素质，素质使得患病的潜在倾向变为了现实；另一方面，素质可能调节着压力对抑郁的影响程度：当压力与素质均为连续变量时，随着素质水平的提高，压力对抑郁的影响越来越大；当压力为连续变量、素质为非连续变量时，素质的调节作用的发挥与其阈限有关：素质阈限以下的个体不会产生抑郁障碍；当素质高于其阈限值时，压力才有可能对抑郁产生影响。而且，在素质压力理论看来，压力事件的出现会引发个体对支持资源的需求，低水平的社会支持将会增加个体对抑郁的易感性(Auerbach, Bigda-Peyton, Eberhart, Webb, & Ho, 2011)。就留守儿童而言，日常生活中由于缺少了父母的陪伴、关心与帮助，很多事情需要自己独立去面对与解决，一些基本的生理与心理需求被忽视或得不到满足，导致其生活压力较高，从而产生一些与抑郁有关的消极情绪体验，如委屈、难过、伤心、无助等（刘霞,赵景欣,申继亮,2007; 范兴华, 2012）；也使得他们普遍比较在意别人的看法、对自己却没有自信，敏感与自卑是其“代表性”的情绪体验(刘霞等, 2007)。为了缓解父母不在身边给自身成长带来的不利影响，留守儿童常常会主动去寻求朋友的支持，如找朋友玩耍、聊天、谈心等（范兴华, 2012）。

这种以玩耍、聊天、谈心为主要活动内容的同伴友谊以及以敏感、自卑为主要特征的神质人格、低自尊，究竟在父母关爱缺失与其抑郁的关系中扮演了何种角色？素质压力理论为此探究提供了理论框架。

(2) 针对“相关变量的联系逻辑不清楚的问题”，对文中变量关系所做的具体修改

1.1 父母关爱缺失与留守儿童抑郁情绪

根据素质压力理论，压力是抑郁的诱因。在 Hobfoll (2001)看来，压力是指被打破了平衡状态的个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通常在“个体的资源遭受了损失、损失的威胁或未能获得充足的资源”三种情况下发生。……父/母虽然长期在外，但并未完全成为留守儿童成长的旁观者，他们一般会通过电话、短信、微信与视频聊天等方式与孩子进行互动。基于这一情况，同时为便于与非留守儿童进行比较，范兴华（2012）将“父母给予儿童帮助、指导、鼓励、肯定以及与孩子沟通交流等发生的情况”定义为父母关爱。研究发现，与非留守儿童相比，留守儿童感知到的父母关爱少（范兴华,何苗,陈锋菊,2012），他们对来自家庭领域的需要更未得到满足,他们爱父母并被父母所爱的需要更加强烈(常青,夏绪仁,2008)。这意味着，留守生活既减损了儿童的父母关爱资源，也阻碍了儿童对父母关爱需求的满足。按照 Hobfoll(2001)的压力定义推断，父母关爱资源的缺失必将给儿童生活带来压力感。

父母关爱缺失这一生活压力，是否会诱发个体的抑郁情绪？……。但我们注意到，以往研究对象均为普通的儿童青少年，其父母关爱通常通过面对面的互动来实现；本研究对象为留守儿童，外出父/母主要通过电话、短信等方式来表达关爱，面对面的亲子互动很少。这种基于缺少直接互动的父母关爱，对儿童的抑郁情绪是否仍有重要影响？我们认为，尽管关爱的形式发生了变化，但关爱的本质内涵并未改变，它对儿童成长的影响依然存在。据此假设 H₁:父母关爱对留守儿童抑郁有即时与延时的负向预测作用。

1.2 自尊、神经质人格在父母关爱缺失与留守儿童抑郁间的中介作用

素质压力理论认为，压力通过激发素质来影响抑郁的发展。这意味着，父母关爱缺失对留守儿童抑郁的影响将通过某些素质的中介作用来实现。……可见，在压力情境下，低自尊与高神经质均使得个体对负性情绪信息较为敏感；而且，当它们一起对抑郁进行预测时，两者的主效应均显著(Roberts & Kendler, 1999)。这说明，低自尊与神经质是结构上既有关联又相对独立的两种抑郁素质。

从发展的角度看，自尊、神经质属于人格变量的范畴，亦可作为个体社会性发展结果的指标。自尊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青少年的自我理解，很可能是一个波动的动态结构，容易受到各种外部困难和内部困难的影响(Orth & Robins, 2014; Ramsawh, Ancoli-Israel, Sullivan, & Hitchcock, 2011)。神经质作为人格的核心成分之一，出现在童年晚期，随着年龄增长稳定性不断增加，成熟于成年期(Costa & McCrae, 1988; Lamb, Chuang, Wessels, Broberg, & Hwang, 2002)；在此期间，童年逆境、慢性的人际生活压力等环境因素对其发展存在不利影响(Ramsawh, et al., 2011; Uliaszek, et al., 2010)。一些研究发现，……。这些结果表明，父母关爱对儿童青少年自尊、神经质人格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且深远的积极影响，父母关爱缺失将对其发展构成威胁。

综上，低自尊与神经质人格作为两种不同的抑郁素质，对抑郁有即时预测性；父母关爱则对自尊与神经质人格既有即时影响也有延时影响。但这些研究探讨的是父母关爱、自尊/神经质、抑郁三者中的两两关系，对自尊/神经质在关爱与抑郁关系中的作用没有考察；而且，相关研究集中在普通的儿童青少年群体，缺乏对亲子长期分离的留守儿童群体的研究。基于上述研究结果及现状，同时依据变量的中介作用原理，提出假设 H₂：在父母关爱对留守儿童抑郁的即时预测关系中，自尊与神经质起中介作用；延时预测关系中，后测自尊与神经质起中介作用。

1.3 自尊、神经质人格在父母关爱缺失与留守儿童抑郁间的调节作用

素质压力理论指出,人格、生理或基因方面的抑郁易感性不同,将导致个体在压力状态下体验到的抑郁情绪各异(Belsky & Pluess, 2009)。低自尊个体对抑郁的易感性较高,这将加重压力对其抑郁的不利影响。自尊的缓冲假说也指出(Orth, Robins, & Meier, 2009),压力事件普遍可以导致抑郁,面对挑战性的生活情境时,低自尊个体由于缺少足够的应对资源而容易遭受抑郁,高自尊者因拥有较好的应对资源故能有效缓解压力对心理健康的侵害。研究发现,自尊能有效缓冲总的生活压力对大学生抑郁(Eisenbarth, 2012)、低水平亲子关系对青少年抑郁(党清秀,李英,张宝山,2016)以及童年期的情感忽视对青少年期抑郁(凌宇,杨娟,钟斌,章晨晨,姚树桥,2009)的不利影响,从而支持了自尊的缓冲假说。但一些研究结果并未支持这一假说(Orth, et al., 2009; Moksnes, Bradley Eilertsen, & Lazarewicz, 2016; 吴文峰,卢永彪,2012)。基于不一致的研究结果,有研究者认为,自尊可能仅仅对特定类型的压力生活事件具有缓冲效应(Moksnes, Moljord, Espnes, & Byrne, 2010)。因此,对自尊是否调节父母关爱缺失这一特定压力对儿童抑郁的影响进行探讨,仍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神经质是与抑郁体验密切相关的人格因子。高水平的神经质使得个体对“压力生活事件导致抑郁”具有一种预定的倾向性(Hammen, 2005)。用于评估疾病风险的阳性乘法模型(the positive multiplicative model)认为,神经质与逆境(adversity)对疾病风险存在交互影响,随着神经质水平的提高,逆境对疾病风险的影响增加(Kendler, Kuhn, & Prescott, 2004)。该模型在以抑郁症为结果变量的相关研究中获得了支持。例如,Vinkers等人(2014)以2837名18-65岁普通人群为被试的研究发现,神经质与累积压力(由童年期虐待、日常烦恼和压力生活事件三者的Z分数相加而成)的交互项对抑郁症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随着神经质水平的提高,累积压力对抑郁症的不利影响加大。再如,Brown和Rosellini(2011)以826名有情绪障碍的门诊病人为样本进行为期一年的追踪研究,结果表明,神经质与慢性压力的交互项对抑郁症初始水平以及抑郁症变化均有显著正向预测效应。总之,神经质作为一种典型的抑郁素质,不仅会增加个体罹患抑郁的整体风险,而且可能会增加逆境中个体罹患抑郁的易感性。

父母关爱缺失是留守儿童必须面对的慢性生活压力之一,不同于以往研究中的任何一种压力。它对儿童抑郁的影响是否会受到自尊与神经质的调节?目前尚无直接的相关证据。但有研究显示,与非留守儿童相比,留守儿童的自尊较低、神经质水平较高的同时,其抑郁水平也较高(Liu, et al., 2015; 兰燕灵等,2009)。这是否是因为较低的自尊和较高的神经质导致留守儿童对缺少父母呵护等消极环境信息较为敏感,进而加重了父母关爱缺失对抑郁的不利影响?基于自尊的缓冲假说和评估疾病风险的阳性乘法模型的观点,在H₁的基础上进一步假设H₃:在父母关爱对留守儿童抑郁的即时预测关系中,自尊起加强作用,神经质有减弱作用;延时预测关系中,后测自尊与神经质亦起调节作用。

1.4 友谊质量对父母关爱缺失与留守儿童抑郁、自尊、神经质关系的调节作用

按照素质压力模型的观点,压力事件发生之后,低水平的社会支持将会增加个体对抑郁的易感性(Auerbach, et al., 2011)。社会支持理论(social provisional theory)指出,父母和同伴是影响儿童青少年发展的两种重要支持来源,当一种关系较差时,另一种关系就会变得更为重要(Furman & Buhrmester,1985)。同伴友谊作为儿童的一种重要的社会支持资源,不仅可以使儿童学会情绪表达与调节、获得情感支持和体验到安全感与信心(Wen & Lin, 2012),而且具有潜在的治疗功能,可以帮助身处逆境(如遭受社交孤立、同伴欺侮)的儿童避免孤独感与抑郁情绪(Zhao, Liu, & Wang, 2015)。对留守儿童而言,由于父/母长期不在身边,他们可能选择更多地与同伴进行交往,因而友谊对其发展可能具有更为重要的作用。

研究证实,积极的友谊关系可以调节不良的亲子关系与儿童青少年适应结果之间的关系。例如,Laible, Carlo和Raffaelli(2000)有关亲子依恋与同伴依恋对青少年适应的交互影响的研究显示,亲子依恋与同伴依恋均较好的儿童,在抑郁、攻击性行为等方面的适应状况最好;亲子依恋与同伴关系均较差的儿童适应状况则最差。Rubin, Dwyer, Kim, Burgess,

Booth-LaForce和Rose-Krasnor(2004)的研究发现,与最要好朋友的友谊质量可以缓冲低水平母亲支持对五年级儿童内倾问题的不利影响:随着友谊质量的提高,低水平母亲支持对儿童内倾问题的不利影响减少。……。然而,上述调节效应均来自亲子长期生活在一起的儿童青少年,其结论对亲子长期分离的留守儿童是否成立还有待检验。据此假设H₄: ……………。

不仅如此,与同伴的交往经验可以发展儿童的角色采择技能,较高的角色采择技能有助于儿童更好的理解他人的思想与情感(林崇德,2008);童年期的父母关爱对成年期抑郁(Lancaster, et al., 2007)、自尊(Engert, et al., 2010)、神经质人格(Reti, et al., 2002)均有延时预测效应。这意味着,积极的同伴交往经验可能会加深儿童对父母关爱的理解,进而增强对性格与情感的延时影响。对留守儿童而言,由于亲子长期分离,他们可能更多的将人际交往的重心倚于同伴,并发展起积极的友谊关系;高水平的友谊不仅能提升他们的角色采择技能,而且有助于他们更好的理解父/母外出“挣钱养家”与“挣钱供孩子读书”(王慰,刘强,韩郁郁, 2012)等动因中所蕴含的“对家庭与子女的爱”,进而缓解父母关爱缺失对其后续发展带来的不利。据此假设H₅: 与最要好友伴的友谊质量可以加强父母关爱对留守儿童自尊、神经质人格、抑郁的延时影响,即友谊质量越高,父母关爱对自尊的延时正向预测力和对神经质人格与抑郁的延时负向预测力就越强。

再者,儿童对友谊质量的认知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步深化:6-8岁儿童只能认识到友谊质量中的一些外在的行为特征,以后才能逐渐认识到那些内在的、情感性的特征;而且,先前认识到的外在特征并未随儿童年龄的增长而被取代,而是与内在的、情感性的特性结合在一起,在认知中逐渐深化,其转折的关键年龄为10~15岁,即小学六年级至初中阶段(李淑湘,陈会昌,陈英和,1997)。Sullivan指出,友谊,尤其是青春期之前建立起的友谊,能够帮助青少年矫正童年期亲子不良交往经历的影响(高琨,邹泓, 2001)。这意味着,与小学留守儿童相比,初中留守儿童对友谊质量的内在的、情感性的认识更加深刻,这将有助于他们消解与父母关爱缺失有关的消极经历(如“被抛弃感”)给后续成长带来的负面影响,即友谊质量调节效应的发挥可能受到年龄段(小学VS.初中)的调节。据此假设H₆: 友谊质量对父母关爱与自尊、神经质和抑郁的关系的调节效应仅发生在初中留守儿童中。

意见 2: 本研究采用的被试样本在两个时间点都是相同的留守状态,也就是说这几年单留守、双留守、非留守状况未变,在模型中为什么没有控制 T2 的父母关爱而直接只分析 T1 对 T2 的抑郁、神经症和自尊的影响? 这里即刻和延时的作用分别有多大的效应量,需要进一步分析阐述。

回应: 此意见与审稿人 2 意见 1 均涉及到研究模型的修改。基于这两条意见,我们做了如下工作: (1) 根据素质压力理论的框架,对研究的假设模型进行了修改与完善; (2) 根据修改后的模型对统计处理方法的表述、结果与分析、讨论部分以及摘要部分均作了相应修改。修改的具体内容如下:

2.1 修改后的模型及相关表述

综合上述六个研究假设,将其归纳为2个假设模型: (1) 即时预测模型(M1): 控制性别的作用后, T1父母关爱对T1抑郁有即时预测效应, 此关系受到T1自尊与T1神经质的中介和调节; 同时, T1父母关爱对T1抑郁、T1自尊、T1神经质的预测关系受到T1友谊质量的调节; (2) 延时预测模型(M2): 控制性别对T2抑郁的作用后, T1父母关爱对T2抑郁有延时预测效应, 其预测关系受到T2自尊、T2神经质的中介和调节; 同时, T1父母关爱对T2抑郁、T2自尊、T2神经质的影响受到T1友谊质量的调节。由于父母对学龄期子女(Mestapelto, Pulkkinen, & Puikkuus, 2001)与青少年早期(Moilanen, Rasmussen, & Padilla-Walker, 2014)子女的教学方式均具有较高的稳定性, 因此, 拟在控制性别作用的基础上增加控制T2父母关爱对T2自尊、T2神经质与T2抑郁的作用, 以考察两种不同控制条件下T1父母关爱对T2抑郁

的延时影响机制及其变化。无论是M1还是M2模型的检验中，如果T1友谊质量的调节效应显著，则进一步考察该调节效应是否受年龄段（小学vs.初中）的调节。待检验的假设模型见图1与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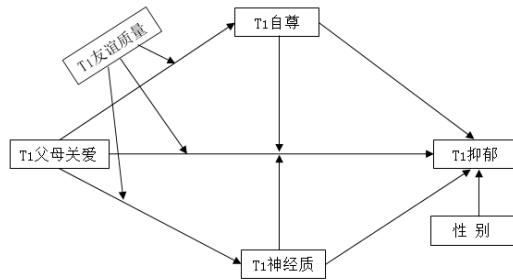


图1 父母关爱对留守儿童抑郁的即时影响模型 (M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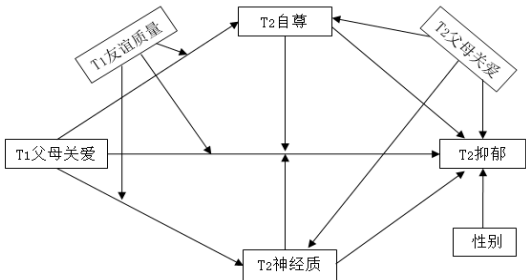


图2 父母关爱对留守儿童抑郁的延时影响模型 (M2)

2.2 模型修改后，文中“2.4 统计处理”部分修改后的表述

模型检验时，采用协方差结构方程模型对即时预测模型 M1、延时预测模型 M2 分别进行考察。由于 M1 与 M2 中均假定自尊与神经质在关爱与抑郁之间既起中介作用又起调节作用，而对于此类假设（即同一变量在一个模型中既起中介又起调节作用的假设），通常将两者分开进行检验。因此，对 M1 和 M2 的检验均包含两步：（1）检验自尊与神经质在父母关爱→抑郁路径中的中介作用以及友谊质量对父母关爱→抑郁、自尊与神经质三条路径的调节作用；（2）检验自尊、神经质对父母关爱→抑郁的调节作用。而且，对 M2 进行上述检验时，进一步区分了仅控制性别对 T2 抑郁的作用与同时控制性别对 T2 抑郁以及 T2 父母关爱对 T2 自尊、T2 神经质与 T2 抑郁的作用这两种情况，以更清楚的考察父母关爱对抑郁的延时影响机制。

2.3 文中“3 结果与分析”部分增加的分析内容

（1）“3.2.1 即时预测模型 M1 的检验”增加的分析

3.2.1 即时预测模型 M1 的检验

首先，对 M1 中自尊与神经质的中介作用以及友谊质量对父母关爱→抑郁、自尊与神经质路径的调节作用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未包括 0，中介效应显著。

其次，对 M1 模型中自尊与神经质对父母关爱→抑郁路径的调节作用进行检验。模型的整体拟合指数较差($\chi^2/df=7.10$, $NFI=0.46$, $IFI=0.50$, $CFI=0.48$, $RMSEA=0.202$)，而且，T1 父母关爱×T1 自尊 ($\beta=-0.07, p>0.05$)、T1 父母关爱×T1 神经质 ($\beta=0.03, p>0.05$) 对 T1 抑郁的预测作用均不显著。

（2）“3.2.2 延时预测模型 M2 的检验”增加的分析

首先，考察在控制性别的作用后 T2 自尊与 T2 神经质的延时中介作用以及 T1 友谊质量对 T1 父母关爱→T2 抑郁、T2 自尊与 T2 神经质路径的调节作用。……。删除这两条路径，同时增加 T1 父母关爱与 T1 友谊质量、T1 父母关爱与 T1 关爱×T1 友谊交互项、T2 自尊与 T2 神经质的残差的相关，……。

其次，在图 4 初始模型的基础上增加控制了 T2 父母关爱对 T2 自尊、T2 神经质与 T2 抑郁的作用。结果显示，模型的整体拟合指数较差($\chi^2/df=8.26$, $NFI=0.59$, $IFI=0.62$, $CFI=0.60$, $RMSEA=0.220$)，且 T1 父母关爱对 T2 自尊、T2 神经质的预测系数，T1 友谊质量对 T2 抑郁的预测作用以及 T1 父母关爱×T1 友谊质量交互项对 T2 抑郁的预测作用均不显著，其他路径系数（接近）显著。删除这些不显著的路径，同时增加 T1 父母关爱与 T2 父母关爱以及 T2 自尊与 T2 神经质间残差的相关，模型的整体拟合指数变得可以接受($\chi^2/df=1.90$, $NFI=0.90$, $IFI=0.95$, $CFI=0.95$, $RMSEA=0.077$)。由图 5 可知，在同时控制性别与 T2 父母关爱的作用后，T1 父母关爱对 T2 抑郁的直接效应接近显著($\beta=-0.14, p<0.08$)，但与仅控制性别作用时相比($\beta=-0.28, p<0.001$)，预测能力明显降低；同时，T1 父母关爱对 T2 自尊与神经质的预测作用不显著，说明 T2 自尊与神经质对 T1 父母关爱与 T2 抑郁关系的直接中介作用消失；此外，T1 父母关爱×T1 友谊质量对 T2 自尊 ($\beta=0.15, p<0.05$) 与 T2 神经质 ($\beta=-0.15, p<0.05$)

的预测作用均显著，且与控制 T2 父母关爱作用前的预测能力基本相同、预测性质不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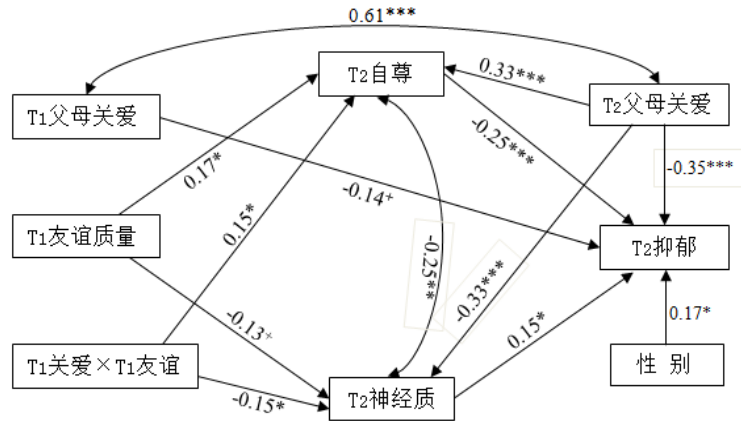


图5 控制性别与T2父母关爱作用后,T1父母关爱对留守儿童T2抑郁的延时影响模型

再者，考察 T1 友谊质量的调节效应是否受到学龄段的调节。对小学留守儿童而言，图 4 模型 ($\chi^2/df=2.42, NFI=0.70, IFI=0.80, CFI=0.76, RMSEA=0.160$)、图 5 模型 ($\chi^2/df=1.97, NFI=0.72, IFI=0.84, CFI=0.82, RMSEA=0.133$) 的整体拟合指数均较差，同时 T1 父母关爱 \times T1 友谊质量交互项对 T2 自尊与 T2 神经质的预测作用均不显著。对初中留守儿童而言，图 4 模型 ($\chi^2/df=1.46, NFI=0.91, IFI=0.97, CFI=0.97, RMSEA=0.070$)、图 5 模型 ($\chi^2/df=1.57, NFI=0.90, IFI=0.96, CFI=0.96, RMSEA=0.075$) 的整体拟合指数均在可接受范围内，且 T1 父母关爱 \times T1 友谊质量交互项对 T2 自尊 ($\beta=0.23/0.20$) /神经质 ($\beta=-0.23/-0.30$) 的作用均显著 ($p<0.05$)。这说明，在控制性别作用后，无论是否再控制 T2 父母关爱的作用，T1 友谊质量对 T1 父母关爱与 T2 抑郁关系的调节效应均稳定地存在于初中留守儿童群体中。对调节效应的进一步分析发现，在 T1 友谊质量低、中、高三组中，T1 父母关爱对 T2 自尊的预测值 β 分别是 0.20 ($p>0.05$)、0.38 ($p<0.01$)、0.62 ($p<0.05$)，对 T2 神经质的预测系数 β 依次为 -0.27 ($p>0.05$)、-0.35 ($p<0.01$)、-0.59 ($p<0.05$)。这表明，随着 T1 友谊质量的提高，T1 父母关爱对初中留守儿童 T2 自尊的正向预测力以及 T2 神经质的负向预测力增大，该交互效应与总样本中交互作用的实质一致。

最后，对 M2 模型中 T2 自尊与 T2 神经质对 T1 父母关爱 \rightarrow T2 抑郁路径的调节作用进行检验。无论是仅控制性别 ($\chi^2/df=5.16, NFI=0.49, IFI=0.54, CFI=0.52, RMSEA=0.166$) 还是同时控制性别与 T2 父母关爱的作用 ($\chi^2/df=7.67, NFI=0.37, IFI=0.40, CFI=0.38, RMSEA=0.211$)，模型的整体拟合情况均较差；而且，T1 父母关爱 \times T2 自尊 ($\beta=-0.04, p>0.05$; $\beta=-0.04, p>0.05$)、T1 父母关爱 \times T2 神经质 ($\beta=0.04, p>0.05$; $\beta=0.05, p>0.05$) 对 T2 抑郁的预测作用在两种控制条件下均不显著。

(3) “3.2 模型检验”总结修改后的表述

通过对 M1 与 M2 模型的检验，获得如下结果：(1) 在仅控制性别对抑郁的作用后，父母关爱对留守儿童抑郁既有即时的也有延时的负向预测效应，自尊与神经质在即时预测中和后测自尊与后神经质在延时预测中分别起部分中介作用， H_1 与 H_2 得以验证；在增加控制后测父母关爱的作用后，前测父母关爱对后测抑郁仍有延时预测效应，但比仅控制性别时的预测能力明显降低；同时，T2 自尊与神经质对 T1 父母关爱与 T2 抑郁关系的直接中介作用消失；(2) 上述两种控制条件下，友谊质量可加强父母关爱对自尊、神经质人格的延时影响，且调节效应仅发生在初中留守儿童中， H_5 中部分假设以及 H_6 被证实；(3) 友谊质量不能调节父母关爱对自尊、神经质人格的即时影响，友谊质量、自尊、神经质均不能调节父母关爱对抑郁的即时影响与延时影响， H_3 与 H_4 未获支持。

2.4 模型修改后，讨论部分增加的内容

4.2 父母关爱对留守儿童抑郁的影响

本研究还发现，在同时控制性别与后测父母关爱的作用后，前测父母关爱对后测抑郁仍有直接预测效应 ($\beta=-0.14, p<0.08$)，但与仅控制性别时 ($\beta=-0.28, p<0.001$) 的预测效应明显降低。

结合图5中T1父母关爱与T2父母关爱的相关关系 ($r=0.61, p<0.001$) 以及T2父母关爱对T2抑郁、T2自尊、T2神经质均具有显著预测效应这一情况, 可知推定, T1父母关爱可通过T2父母关爱的部分中介作用或直接对T2抑郁或再经T2自尊与神经质的中介进而对T2抑郁产生影响, 此时, T2父母关爱的中介效应约占总效应的65% $\{[-0.40-(-0.14)]/-0.40=65\}$ 。这一结果提示, 尽管早期的父母关爱缺失对儿童抑郁的不利影响将长期存在, 但这种影响并非完全不可逆转, 外出打工的父母倘若能把握当下, 给予孩子适当的关爱, 亦能在较大程度上消除前期关爱缺失对当下抑郁的不利影响, 从而起到“亡羊补牢, 未为晚也”之效。

4.3 自尊、神经质在父母关爱与抑郁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父母关爱如何抑制留守儿童抑郁情绪的发展? 本研究发现, 在控制性别对抑郁的作用后, 自尊与神经质在父母关爱对抑郁的即时预测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后测自尊与神经质则在延时预测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在同时控制性别与后测父母关爱的作用后, 后测自尊与神经质对前测父母关爱与后测抑郁关系的直接中介效应消失。依据上一段落中的推定, 它们将转而通过间接的链式中介效应(T1父母关爱→T2父母关爱→T2自尊/T2神经质→T2抑郁)对其发挥作用。这提示, 父母关爱对留守儿童抑郁的抑制作用可部分通过提升其即时或延时的自尊水平和情绪稳定性来实现。

4.4 友谊质量、自尊与神经质对父母关爱与抑郁关系的调节

对M1模型和M2模型的检验结果均显示, 友谊质量、自尊与神经质对父母关爱与抑郁关系的调节作用均不显著, 即针对抑郁这一结果变量的调节作用假设均未获支持, 表明素质压力理论中“素质调节着压力对抑郁的影响程度”的基本观点未被证实。这可能与素质压力理论主要关注消极环境对脆弱性个体的不利影响与忽视个体对积极环境的反应差异问题有关(Ellis, Boyce, Belsky, Bakermans-Kranenburg, & Van Ijzendoorn, 2011)。事实上, 某些个体在消极环境和积极环境中都具有发展可塑性。在差别易感性假说(Differential susceptibility hypothesis)看来(Belsky & Pluess, 2009; 马园园, 周荃, 邢淑芬, 2015), 这种发展可塑性在儿童期主要表现为儿童对抚养环境的影响的敏感性不同: 一些脆弱性个体比其他儿童更容易受消极抚养环境的不利影响, 同时也更容易受积极抚养环境的有利影响。就留守儿童而言, 父母长期外出打工所引发的父母关爱缺失, 无疑是儿童成长的消极抚养因素; 但与此同时, 父母外出打工后, 留守儿童普遍感受到家庭经济状况以及家具与住房等生活条件有了明显改善, 对他们的教育投资能力也有所增强(范兴华, 2012); 换言之, 从家庭经济条件的角度来看, 父母外出打工挣钱为儿童未来发展创造了一种积极的抚养环境。也许, 正是家庭经济状况的改善所带来的这些积极影响, 降低了低友谊质量、低自尊与高神经质个体对父母关爱缺失影响抑郁情绪的敏感性程度, 从而导致调节效应不显著。

2.5 模型修改后, 摘要部分增加的内容

.....。在增加控制后测父母关爱对后测抑郁、自尊、神经质的作用后, 前测父母关爱对后测抑郁的直接预测效应明显降低但仍接近显著, 同时对后测自尊、神经质的直接预测作用不显著; 上述两种不同控制条件下, 前测父母关爱与前测友谊质量的交互项对后测自尊与神经质的预测作用均显著, 具体表现为随着友谊质量的提高, 父母关爱对自尊、神经质的延时影响增大, 且调节效应仅发生在初中留守儿童中。

意见 3: 假设五提出年龄阶段的重要性, 为什么是年龄阶段调节友谊质量调节效应? 这部分理论推导非常突兀, 逻辑性较差, 需要重新商榷。

回应: 针对这一意见, 我们进行了两方面修改: 一是对友谊质量的延时调节效应的论证进一步加强了; 我们之所以主动对此进行修改, 一方面是因为前期论证有待加强, 另一方面是为接下来论证“年龄阶段调节友谊质量调节效应”做一些铺垫; 二是对学龄段调节友谊质量的调节效应进行大幅修改。修改后的表述如下:

不仅如此, 与同伴的交往经验可以发展儿童的角色采择技能, 较高的角色采择技能有助

于儿童更好的理解他人的思想与情感(林崇德,2008);童年期的父母关爱对成年期抑郁(Lancaster, et al., 2007)、自尊 (Engert,et al.,2010)、神经质人格 (Reti, et al.,2002) 均有延时预测效应。这意味着,积极的同伴交往经验可能会加深儿童对父母关爱的理解,进而增强对性格与情感的延时影响。对留守儿童而言,由于亲子长期分离,他们可能更多的将人际交往的重心倚于同伴,并发展起积极的友谊关系;高水平的友谊不仅能提升他们的角色采择技能,而且有助于他们更好的理解父/母外出“挣钱养家”与“挣钱供孩子读书”(王慰,刘强,韩郁郁,2012)等动因中所蕴含的“对家庭与子女的爱”,进而缓解父母关爱缺失对其后续发展带来的不利。据此假设H₅:与最要好友伴的友谊质量可以加强父母关爱对留守儿童自尊、神经质人格、抑郁的延时影响,即友谊质量越高,父母关爱对自尊的延时正向预测力和对神经质人格与抑郁的延时负向预测力就越强。

再者,儿童对友谊质量的认识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步深化:6-8岁儿童只能认识到友谊质量中的一些外在的行为特征,以后才能逐渐认识到那些内在的、情感性的特征;而且,先前认识到的外在特征并未随儿童年龄的增长而被取代,而是与内在的、情感性的特性结合在一起,在认识中逐渐深化,其转折的关键年龄为10~15岁,即小学六年级至初中阶段(李淑湘,陈会昌,陈英和,1997)。Sullivan指出,友谊,尤其是青春期之前建立起的友谊,能够帮助青少年矫正童年期亲子不良交往经历的影响(高琨,邹泓,2001)。这意味着,与小学留守儿童相比,初中留守儿童对友谊质量的内在的、情感性的认识更加深刻,这将有助于他们消解与父母关爱缺失有关的消极经历(如“被抛弃感”)给后续成长带来的负面影响,即友谊质量调节效应的发挥可能受到年龄段(小学VS.初中)的调节。据此假设H₆:友谊质量对父母关爱与自尊、神经质和抑郁的关系的调节效应仅发生在初中留守儿童中。

意见 4: 性别的假设也需要再进一步阐述。

回应: 修改后的表述如下:

1.5 性别与抑郁的关系

研究发现,在学龄儿童阶段,抑郁障碍患病率无明显性别差别(张郭莺,杨彦春,黄颐,刘书君,孙学礼,2010);但进入青春期以后,女性青少年的抑郁水平显著高于男性青少年 (Lin, et al., 2008; Moksnes, et al., 2016),女性罹患抑郁症的人数比例普遍是男性的2~3倍(Parker & Brotchie, 2010);而且,女性中抑郁情绪的遗传率明显高于男性(曹衍淼,王美萍,曹丛,陈光辉,张文新,2013)。这表明,从整体上看,青少年女性对抑郁的易感性比男性要高。因此,假设检验时,将性别作为协变量,以控制其对抑郁的可能影响。

意见 5: 文献回顾不全面。我国学者有关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发展的英文文献几乎没有引用。

回应: 增加了以下五条以留守儿童为研究对象的英文文献

Cheng, J., & Sun, Y.H. (2015). Depression and anxiety among left-behind children in China: a systematic review. *Child: Care, Health and Development*, 41(4), 515-23.

Guo, J., Ren, X. Z., Wang, X. H., Qu, Z.Y., Zhou, Q.Y., Ran, C, et al. (2015). Depression among Migrant and Left-Behind Children in China in Relation to the Quality of Parent-Child and Teacher-Child Relationships. *Plos One*, 10(12),1-15.

Liu, Y., Li, X.W., Chen, L., & Qu, Z.Y. (2015). Perceived positive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as a protective factor for Chinese left-behind children's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adjust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50(5), 354-362,

Wen, M., & Lin, D. H. (2012). Child development in rural China: children left behind by their migrant parents and children of non-migrant families. *Child Development*, 83, 120-136.

Zhao, J. X., Liu, X., & Wang, M. F. (2015). Parent-child cohesion, friend companionship and

审稿人 2 意见：

意见 1：文中作者自己也认为，低自尊和神经质人格是抑郁的易感素质。同时，文中提到的素质压力理论认为，抑郁的发生受到压力事件和易感素质的共同影响。按照素质压力理论，应该重点去考察父母关爱与个体易感素质（低自尊和神经质）的交互作用，而不只满足于去分析后者的中介作用。因此，图 1 中假设的影响机制不够合理。此外，友谊质量作为一种社会支持，是公认的调节变量（在父母关爱或易感素质对抑郁影响的路径中），然而，作者并未在图 1 假设模型中将其作为调节变量去看待。尽管作者在后面的统计分析中考察了父母关于*友谊质量 ON 自尊的调节作用，但这并非针对因变量抑郁的调节作用分析。

回应：此意见与“审稿人 1 意见 2”较一致，相关修改见“审稿人 1 意见 2”的回应。

意见 2：前言中对前人理论和发现的引用有些勉强。例如作者根据社会情绪选择理论推导出中学生同伴关系很重要。事实上，社会情绪选择理论的核心观点是，由于未来时间洞察力的作用，在未来时间有限知觉和无限时间知觉下，个体会分别做出情绪管理导向和知识获取导向两种不同选择。又例如，根据皮亚杰思维发展阶段论，推导出孩子能否知觉到父母的爱，这推论链条太遥远间接不成熟，据此生成的假设也不够合适。整个前言的写作显得铺张、不紧密，建议对前言的整体逻辑进行较大修改。

回应：针对此意见，我们做了两方面修改：一是删除了社会情绪选择理论与皮亚杰思维发展阶段论的相关表述；二是结合其他两位审稿专家的意见，从内容与形式两方面均对前言的整体逻辑进行了修改。

（一）内容方面，重点修改以下几方面

首先，对素质压力理论进行了更为详细的叙述，而且把素质与压力事件与留守儿童的问题直接联系起来；其次，依据素质压力理论的观点，增加了对自尊、神经质、友谊质量与压力的交互作用的理论阐述，并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假设 H3；再者，根据外审专家三的意见，原稿把已有研究发现直接用作了本研究假设，因此，在修改中，我们通过梳理已有研究，适时地指出了已有研究存在的不足，并在此基础上结合留守儿童的实际情况来提出本研究假设。

（二）在形式方面，为清晰地表达研究的思路，我们将前言分为了五个方面来进行论述，这五个方面的标题如下：

- 1.1 父母关爱缺失与留守儿童抑郁情绪
- 1.2 自尊、神经质人格在父母关爱缺失与留守儿童抑郁间的中介作用
- 1.3 自尊、神经质人格在父母关爱缺失与留守儿童抑郁间的调节作用
- 1.4 友谊质量对父母关爱缺失与留守儿童抑郁、自尊、神经质关系的调节作用
- 1.5 性别与抑郁的关系

由于修改的内容较多，且所有修改在修改后的正文中均已用蓝色字体标明，故请专家重新审阅文章的问题提出部分。

意见 3：在相关分析以及中介和调节效应分析中，作者将四年级样本和七年级样本合并起来进行分析，这违背了相关分析的一个原则：尽量保证所研究的变量之外的其它变量的同质性。年龄造成了样本的异质性，可能发生由年龄引发的共变关系。审稿人推测，也许作者是担心拆分年龄组之后样本数量过少。另外，作者结论中说某些效应仅在初中存在，但统计分析过程中并未清楚地显示出哪里是分年龄组，哪里是没有区分。

回应：

(1) 关于样本异质性问题的回答

年龄是发展心理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特殊的自变量。正如专家所言，相关分析应该遵循“尽量保证所研究的变量之外的其它变量的同质性”原则，以避免由于样本年龄的异质性可能引发的共变关系。根据这一意见，我们对四年级样本与七年级样本在主要研究变量的相关系数上的差异进行了 Z 检验并发现，所有相关系数之间的年级差异均不显著，故将两者合并在一起进行分析，并在“3.1.3 留守儿童研究变量的相关分析”中增加了与此分析结果有关的表述：对四年级、七年级儿童的主要研究变量间的相关分别进行分析，Z 检验发现，两群体在研究变量的即时相关系数和延时相关系数上的差异均不显著，因此，将两个年级的数据合并在一起进行分析。

(2) 针对年龄段信息表述不明确的问题的回答

修改稿中，我们在文章的两个地方增加了相关信息：

(a) 在“2.1 被试”部分增加了有关学段的信息，如表 1 所示。

表1 被试性别、学段与留守类型的分布(n,%)				
	双留守	单留守	非留守	合计
男	36(50.0%)	47(59.5%)	27(48.2%)	110(53.1%)
女	36(50.0%)	32(40.5%)	29(51.8%)	97(46.9%)
四年级	31(43.1%)	28(35.4%)	26(46.4%)	85(41.1%)
七年级	41(56.9%)	51(64.6%)	30(53.6%)	122(58.9%)
合计	72	79	56	207

(b) 在“3.2.2 延时预测模型 M2 的检验”中，分析学段对友谊质量调节效应的调节所做的修改请见“审稿人 1 意见 2”的回应中图 5 正下方段落，即“再者，考察考察 T1 友谊质量的调节效应是否受到学段的调节。……该交互效应与总样本中交互作用的实质一致。”

审稿人 3 意见：

意见 1：问题提出部分第三自然段，作者通过梳理已有文献，认为“综上，低水平的父母关爱是儿童青少年抑郁的风险因素，对抑郁既有即时影响也有延时影响。据此假设一，父母关爱对留守儿童抑郁既有即时的也有延时的负向预测作用。”既然已有研究已经发现，低水平的父母关爱是儿童青少年抑郁的风险因素，对抑郁既有即时影响也有延时影响。为什么本研究还要再研究这一问题，并且还把已有研究发现作为本研究的假设一？

回应：针对这一问题，我们增加论述了“与以往研究样本（普通儿童）相比，留守儿童在父母关爱形式方面表现出来的特殊性”，在此基础上再提出假设 H1。修改后的具体表述如下：

1.1 父母关爱缺失与留守儿童抑郁情绪

父母关爱缺失这一生活压力，是否会诱发个体的抑郁情绪？研究发现，……。这表明，低水平的父母关爱是儿童青少年抑郁的风险因素，对抑郁既有即时影响也有延时影响。但我们注意到，以往研究对象均为普通的儿童青少年，其父母关爱通常通过面对面的互动来实现；本研究对象为留守儿童，外出父/母主要通过电话、短信等方式来表达关爱，面对面的亲子互动很少。这种建立在长期缺少直接互动基础上的父母关爱，对儿童的抑郁情绪是否仍有重要影响？我们认为，尽管关爱的形式发生了变化，但关爱的本质内涵并未改变，它对儿童成长的影响依然存在。据此假设 H₁：父母关爱对留守儿童抑郁有即时与延时的负向预测作用。

意见 2：问题提出部分，作者对有调节的即时中介模型(M1)和有调节的延时中介模型(M2)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理论分析。如同第一个问题，作者还是把已有研究发现作为本研究的假设，

还是通过梳理已有研究,创新性地提出自己的研究假设?建议作者在文献综述时适时地指出已有研究的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研究的创新性假设。

回应: 根据这一意见,对原文假设提出的依据进行了补充,重点指出了已有研究的不足。具体修改如下:

(1) 有关 H2 假设提出时的修改

综上,低自尊与神经质人格作为两种不同的抑郁素质,对抑郁有即时预测性;父母关爱则对自尊与神经质人格既有即时影响也有延时影响。但这些研究探讨的是父母关爱、自尊/神经质、抑郁三者中的两两关系,对自尊/神经质在关爱与抑郁关系中的作用没有考察;而且,相关研究集中在普通的儿童青少年群体,缺乏对亲子长期分离的留守儿童群体的研究。基于上述研究结果及现状,同时依据变量的中介作用原理,提出假设 H₂: 在父母关爱对留守儿童抑郁的即时预测关系中,自尊与神经质起中介作用;延时预测关系中,后测自尊与神经质起中介作用。

(2) 有关 H3 假设提出时的修改

根据专家二的审稿意见,假设 H3 的内容为新增内容,即增加了“1.3 自尊、神经质人格在父母关爱缺失与留守儿童抑郁间的调节作用”部分。相关假设提出时的表述如下:

父母关爱缺失是留守儿童必须面对的慢性生活压力之一,不同于以往研究中的任何一种压力。它对儿童抑郁的影响是否会受到自尊与神经质的调节?目前尚无直接的相关证据。但有研究显示,与非留守儿童相比,留守儿童的自尊较低、神经质水平较高的同时,其抑郁水平也较高(Liu, et al., 2015; 兰燕灵等,2009)。这是否是因为较低的自尊和较高的神经质导致留守儿童对缺少父母呵护等消极环境信息较为敏感,进而加重了父母关爱缺失对抑郁的不利影响?基于自尊的缓冲假说和评估疾病风险的阳性乘法模型的观点,在H₁的基础上进一步假设H₃: 在父母关爱对留守儿童抑郁的即时预测关系中,自尊起加强作用,神经质有减弱作用;延时预测关系中,后测自尊与神经质亦起调节作用。

(3) 有关 H4、H5 和 H6 假设提出时的修改

H4、H5和H6这三个假设的修改均集中在文中的“1.4 友谊质量对父母关爱缺失与留守儿童抑郁、自尊、神经质关系的调节作用”部分,修改的相关表述如下:

然而,上述调节效应均来自亲子长期生活在一起的儿童青少年,其结论对亲子长期分离的留守儿童是否成立还有待检验。据此假设H₄:

不仅如此,与同伴的交往经验可以发展儿童的角色采择技能,.....。对留守儿童而言,由于亲子长期分离,他们可能更多的将人际交往的重心倚于同伴,并发展起积极的友谊关系;高水平的友谊不仅能提升他们的角色采择技能,而且有助于他们更好的理解父/母外出“挣钱养家”与“挣钱供孩子读书”(王慰, 刘强, 韩郁郁, 2012)等动因中所蕴含的“对家庭与子女的爱”,进而缓解父母关爱缺失对其后续发展带来的不利。据此假设H₅:

再者,儿童对友谊质量的认知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步深化:.....。这意味着,与小学留守儿童相比,初中留守儿童对友谊质量的内在的、情感性的认识更加深刻,这将有助于他们消解与父母关爱缺失有关的消极经历(如“被抛弃感”)给后续成长带来的负面影响,即友谊质量调节效应的发挥可能受到年龄段(小学VS.初中)的调节。据此假设H₆:

意见 3: 关于本研究的被试问题。首先,本研究的有效被试共 207 名,包括留守儿童 72 人、单留守儿童 79 人、非留守儿童 56 人。作为问卷研究,207 名被试样本略显不足。其次,本研究把儿童分为双留守和单留守的意义何在?请作者说明。再次,本研究的被试包括小学四年级和初中七年级两个学段,总被试量为 207 名,每个学段的三种留守类型的被试大约为 103 名(建议作者提供小学和初中被试的具体情况)。作者指出本研究考察的变量之间的关系在不同发展阶段可能有所不同,研究结果也为此提供初步的支持。但是作为问卷调查,每

个学段三种类型的留守儿童总共才 100 名被试。相对于本研究对变量间复杂关系的考察，进一步扩大本研究的被试样本量可以进一步提高本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回应：

(1) 关于“被试样本略显不足”的问题说明

被试样本略显不足是本研究的一个局限性。针对这一问题，我们在“4.5 研究的意义、局限性及启示”中增加了如下相关表述，以提示读者和感兴趣的研究者：

研究亦存在三方面的局限性。……。三是被试包括小学四年级和初中一年级两个学段，总共 207 人，每个学段内单留守、双留守、非留守三类儿童的人数在 26~51 人之间，整体上样本量较少。尤其是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考察研究假设模型对小学与初中学段留守儿童各自的适用性时，样本量不足的局限性较为明显。因此，针对本研究较复杂变量关系的考察，扩大样本量可能有助于进一步提高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2)关于把儿童分为双留守和单留守的意义以及两个年龄段中三类儿童分布的情况说明

针对上述两个问题，作者对“2.1被试”部分进行修改后，增加的表述如下：

有研究发现，双亲外出打工的儿童（即双留守儿童）的抑郁得分显著高于单亲外出打工的儿童（即单留守儿童）（王晓丽,胡心怡,申继亮, 2011; Zhao, et al., 2015）；但也有研究表明两者差异不显著（范兴华,2012; Guo, et al., 2015）。考虑到研究结果存在不一致现象，有必要对此作进一步探讨，故将留守儿童区分为单留守、双留守两类儿童。……，被试性别、年龄段以及留守类型的分布见表1。

表1 被试性别、年龄段与留守类型的分布(n,%)

	双留守	单留守	非留守	合计
男	36(50.0%)	47(59.5%)	27(48.2%)	110(53.1%)
女	36(50.0%)	32(40.5%)	29(51.8%)	97(46.9%)
四年级	31(43.1%)	28(35.4%)	26(46.4%)	85(41.1%)
七年级	41(56.9%)	51(64.6%)	30(53.6%)	122(58.9%)
合计	72	79	56	207

意见 4：关于研究结果部分的问题。“我们进一步考察了 T1 友谊质量的调节效应是否受到年龄段的调节。对小学留守儿童而言，M2 模型的整体拟合指数较差 ($\chi^2/df=3.52, NFI=0.71, IFI=0.80, CFI=0.75, RMSEA=0.175$)，且 T1 父母关爱×T1 友谊质量交互项对 T2 自尊 ($\beta=0.20, p=0.126$) 与 T2 神经质 ($\beta=-0.18, p=0.187$) 的预测作用均不显著；对初中留守儿童而言，M2 模型的整体拟合指数均在可接受范围内 ($\chi^2/df=1.58, NFI=0.90, IFI=0.96, CFI=0.95, RMSEA=0.079$)，且 T1 父母关爱×T1 友谊质量交互项对 T2 自尊 ($\beta=0.28, p<0.01$) 与 T2 神经质 ($\beta=-0.23, p<0.05$) 的预测作用均显著。说明，T1 友谊质量的调节效应受到了年龄段的调节，且调节效应仅发生在初中学段的留守儿童中。”建议作者进一步补充说明初中阶段 T1 友谊质量对 T1 父母关爱和 T2 自尊与神经质关系的调节作用情况，例如高友谊质量和低友谊质量情况下，T1 父母关爱和 T2 自尊与神经质关系有何不同？

回应：此条意见与“审稿人 1 意见 2”中的部分内容以及“审稿人 2 意见 3”内容较大交叉，故本文综合在一起进行回答，具体修改请见“审稿人 1 意见 2”的回应中图 5 正下方段落，即“再者，考察考察 T1 友谊质量的调节效应是否受到年龄段的调节。……该交互效应与总样本中交互作用的实质一致。”

第二轮

审稿人 1 意见:

意见 1: 本研究的被试量问题仍然是需要讨论。在研究中需要涉及许多变量之间复杂的关系,被试数量太少会影响到结果的信效度。

回应: 针对该问题,我们仔细阅读了侯杰泰、温忠麟和成子娟(2004)三位老师合著的《结构方程模型及其应用》一书中关于“样本容量”的相关论述,运用该书中的相关观点对本文研究模型所需的最低样本量进行了具体分析,以说明被试数量对研究结果的信效度的影响。原文中有关被试量问题的讨论体现在“4.5 研究的意义、局限性及启示”部分第三段的“三是被试包括小学四年级和初中一年级两个学段,总共 207 人,……,扩大样本量可能有助于进一步提高研究结果的可靠性。”的描述当中。对该段文字进行修改,表述如下:

三是留守儿童被试共151人,含四年级59人、七年级92人,整体上样本量较少。样本量较少,所产生的相关矩阵不够稳定,使得结构方程分析结果的信度(可重复性)低,进而影响其效度。为此,Bentle提出样本容量至少要有待估计参数数目的5倍以上(侯杰泰,温忠麟,成子娟,2004)。本研究的所有模型中,图5的初始模型最为复杂,待估计的参数多达17个。按照Bentle的观点推算,图5模型的分析至少需要85名被试。据此可知,本研究的总样本量和七年级被试人数均可满足模型分析所需的最低样本容量要求,但四年级的样本量尚未达到这一标准。因此,扩大样本量有助于提高研究结果的信效度。

Hau, K. T., Wen, Z., & Cheng, Z. (2004).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and its applications*. Beijing: Educational Science Publishing House.

[侯杰泰, 温忠麟, 成子娟.(2004). 结构方程模型及其应用.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意见 2: 有些重要因素未被纳入,比如如何控制父母离开时儿童年龄、父母与儿童的沟通质量和数量等等,是否涉及过这些重要变量,或者将其作为控制变量?因为以往大量研究都已探讨这些因素与留守儿童自尊和抑郁的重要关系。尽管研究中设计留守时间作为变量,但是同样的留守时间(比如9年)对于不同年级儿童意义不同,所产生的影响也有所不同。

回应: 设计研究问卷时,我们没有收集父母离开时儿童年龄和亲子沟通方面的信息,因此,此次修改无法将这些变量纳入结果与分析部分。但是,我们查阅了相关文献,并将以往研究结果呈现在“4.5 研究的意义、局限性及启示”部分的“局限性”中,为后续研究提供借鉴。增加的具体表述如下:

4.5 研究的意义、局限性及启示

研究亦存在四方面的局限性。……四是可能还有重要因素未被纳入研究。虽然本研究考虑了留守时间对抑郁的影响,但有研究发现,分离年龄(即父母外出时儿童年龄)与留守时间交互影响着抑郁的发展:6岁前与父母分离的儿童,留守时间对抑郁无明显影响;6岁后分离的儿童,留守时间越长,抑郁水平越高(Ling, Fu, & Zhang, 2015);外出父母与孩子的沟通越频繁、沟通话题越多(如学习体验、学校生活、感受等),孩子的抑郁风险越低(Wang et al., 2015);分离年龄越小、亲子联系越少,儿童的自尊水平越低(程黎,王寅梅,刘玉娟,2012);分离年龄越小,儿童的神经质水平越高(何资桥,2009)。后续研究中,若能将分离年龄的主效应、分离年龄与留守时间的交互作用以及亲子沟通的作用予以控制,可能会进一步提高研究的内部效度。

Ling, H., Fu, E., & Zhang, J. R. (2015). Effects of separation age and separation duration among left-behind children in China.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43(2), 241–254.

Cheng, L., Wang, Y., & Liu, Y. J. (2012). Impact of separation from parents on the esteem among Left-behind-children. *Journal of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 (Educational Science)*, 25(2), 35–38.

[程 黎,王寅梅,刘玉娟.(2012).亲子分离对农村留守儿童自尊的影响.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5(2),35-38.]

He, Z. Q. (2009). Analysis on parent-child separation character affecting the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Left in Rural China. *China Journal of Health Psychology*, 17(11), 1373-1375.

[何资桥.(2009).亲子分离特征对农村留守儿童人格发展影响分析.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17(11),1373-1375.]

Wang, L. F., Feng, Z. Z., Yang, G. Y., Yang, Y. L., Dai, Q., Hu, C. B., ... Zhao, M. X. (2015). The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depressive symptoms in the left-behind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of Chongqing in China.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177, 36-41.

意见 3: 研究中儿童的类别分为三类,即单留守儿童、双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设置这三类儿童的研究意义是什么?在后续的统计中,是否考虑两类留守有可能对于抑郁模型存在不同的影响?

回应: 此意见中涉及两个问题,分(一)和(二)两部分回答。

(一)针对“设置单留守、双留守、非留守这三类儿童的研究意义是什么?”这一问题,我们做了以下四方面工作:1)论证了父亲外出儿童(简称单留守)、双亲外出儿童(简称双留守)占留守儿童群体的绝大多数,而母亲外出的单留守儿童占比很少;2)论证单留守与双留守在抑郁发展差异方面的结果存在明显不一致现象;3)论证了“将不同留守类型儿童设置为实验组、非留守儿童设置为对照组”是以往相关研究的基本范式,同时指出了以往对比研究以横断研究为主的这一缺点;4)在综合上述三方面论证结果的基础上,阐述了设置单留守、双留守、非留守这三类儿童的研究意义。修改后的文字表述请见“2.1 被试”。

2.1 被试

“父母一方或双方外出”是界定留守儿童的基本要素之一,据此可将留守儿童分为父亲外出、母亲外出和双亲外出三类(Wen & Lin, 2012; He et al., 2012)。目前,这三类儿童在留守儿童总体中各自所占的准确比例不详,但在留守儿童人数分别为3575人(姚计海,毛亚庆,2008)、1457人(侯珂等,2014)、4857人(Wang et al., 2015)的三项研究中,父亲外出和双亲外出两类儿童共占被试总数的比例依次为88.6%、94.7%和87.9%。就其抑郁发展而言,有研究发现,双亲外出儿童的抑郁得分显著高于父亲外出儿童(Zhao et al., 2015);但也有研究表明两者差异不显著(范兴华,2012; Guo et al., 2015)。由此可知,留守儿童群体中,父亲外出儿童和双亲外出儿童占绝大多数,而且有关两者在抑郁发展差异方面的结果存在明显不一致现象。此外,以往研究在考察留守现象对儿童抑郁发展的影响时,常常将不同留守类型儿童设置为实验组、非留守儿童设置为对照组,在此基础上开展比较研究(范兴华,2012; Guo et al., 2015; 侯珂等,2014)。但我们注意到,相关比较大多基于横断研究数据,难以揭示留守现象与儿童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

基于上述研究现状,我们选取了相同生活背景下的非留守儿童为对照组,以父亲外出儿童(下称单留守儿童)、双亲外出儿童(下称双留守儿童)为实验组,采用追踪研究设计对其抑郁发展进行探讨,以期揭示留守现象对儿童抑郁发展的影响及其变化趋势,从而为农民工家庭选择“父亲外出”还是“双亲外出”的流动模式提供参考依据。

2009年10月,从湖南省某市(县)城郊、离市区约30公里、离市区约50公里的3个乡镇分别选取初中与小学各1所学校(共6所)作为调查学校,……,平均 10.90 ± 1.58 岁。

此处修改增加的文献如下:

He, B., Fan, J. Y., Liu, N., Li, H. J., Wang, Y. J., Williams, J., & Wong, K. S. (2012). Depression risk of 'left-behind children' in rural China. *Psychiatry Research*, 200(2-3), 306-312.

- Wang, L. F., Feng, Z. Z., Yang, G.Y., Yang, Y. L., Dai, Q., Hu, C. B., ... Zhao, M.X. (2015). The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depressive symptoms in the left-behind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of Chongqing in China.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177, 36–41.
- Yao, J.H., & Mao, Y. Q. (2008). Research on the school work m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western rural parent-absent children and its countermeasure of school management. *Educational Research*, (2), 33–38.
- [姚计海,毛亚庆.(2008).西部农村留守儿童学业心理特点及其学校管理对策研究.教育研究,(2),33-38.]

(二)针对“在后续的统计中,是否考虑两类留守有可能对于抑郁模型存在不同的影响?”这一问题,我们从两方面进行了考察:一是考察了单留守与双留守在研究变量上的得分差异是否显著(注:初稿中已有此结果);二是考察了单留守、双留守在研究变量的相关关系上是否存在显著差异(注:本次补充分析)。结果显示,两类留守儿童在研究变量的得分以及研究变量间相关系数大小上的差异均不显著。因此,后续统计分析中,未考虑留守类型对抑郁模型的可能影响。相关的修改请见 3.1.2 和 3.1.3,具体表述如下:

3.1.2 三类儿童在研究变量上的得分比较及其发展趋势

(最后一段)综上,.....;此外,单、双留守儿童在研究变量上的得分差异不显著,表明留守生活对两类儿童的影响趋于一致。

3.1.3 留守儿童研究变量的相关分析(注:将本次修改与第一次修改中有关年级差异的结果整合在一起)

由于研究要考察的是父母关爱对留守儿童抑郁的影响机制,因此非留守儿童作为对照组不再参与分析。在此基础上,对不同留守类型(单留守 VS.双留守)、不同年级(四年级 VS. 七年级)的留守儿童研究变量间的相关关系分别进行分析。Z 检验发现,单留守与双留守、四年级与七年级儿童在研究变量的即时相关系数和延时相关系数上的差异均不显著,因此,后续统计分析中,将不同留守类型、不同年级的留守儿童数据合在一起进行分析。留守儿童样本研究变量的积差相关系数见表 3。

审稿人 3 意见:

意见 1: 基本概念有待于进一步明晰。父母关爱是本研究的核心概念,在“1.1 父母关爱缺失与留守儿童抑郁情绪”部分,作者提出“在我国,可分为物质关爱(Physical Warmth)与情感关爱(Emotional Warmth)”。但是,在“2.2 研究工具”部分,“父母关爱问卷,共 8 题,要求被试报告最近一年内自己在总体上感觉到的父母给予帮助、鼓励、指导等情况发生的频率”。作者并没有交代清楚本研究考察的是父母关爱是物质关爱还是情感关爱,或者是两者的整合?

回应: 根据这一意见,我们做了以下工作:(1)在“1.1 父母关爱缺失与留守儿童抑郁情绪”部分,对物质关爱和情感关爱的内涵做了较详细的补充阐述;据此分析得出,外出父母给予留守儿童的物质关爱少,但不乏一定的情感关爱。(2)在(1)的基础上,对原文两个地方进行了修改:第一,在“1.1 父母关爱缺失与留守儿童抑郁情绪”部分中的“父母给予儿童帮助、指导、鼓励、肯定以及与孩子沟通交流等发生的情况定义为父母关爱”的后面添加了“主要强调父母在心理和情感层面对孩子的关注和接纳程度”。第二,在“2.2 研究工具”部分中“要求被试报告最近一年内自己在总体上感觉到的父母给予帮助、鼓励、指导等情况发生的频率”的后面添加了“以测查儿童感知到的来自父母的情感关爱”。而且,这一修改与父母关爱问卷编制所参照的情感关系量表(Takahashi & Sakamoto, 2000)的测查重点一致,两者均反映的是人际间的情感关系。修改后的表述如下:

1.1 父母关爱缺失与留守儿童抑郁情绪

根据素质压力理论，压力是抑郁的诱因。在Hobfoll (2001)看来，压力是个体与环境之间的平衡状态被破坏后，个体的资源遭受了损失或损失的威胁或不能获得充足资源的情况下产生的；此处的“资源”既包括钱财、物品、设施等物质资源，也包括家庭稳定、与家人保持亲密感、有时间与家人共处等人际关系资源。对留守儿童而言，父/母外出后，家庭抚养环境发生了改变，亲子间缺乏面对面的直接互动，父母关爱资源面临着缺失。父母关爱(parental care)是父母教养行为的重要方面，在西方主要指父母在心理和情感层面对孩子的关注和接纳程度(Lancaster, Rollinson, & Hill, 2007)；在我国，可分为情感关爱(Emotional Warmth)与物质关爱(Physical Warmth)两个方面。其中，情感关爱与西方的父母关爱概念一致，物质关爱则带有明显的中国文化色彩，包含行为物质关爱和饮食物质关爱，前者指父母为孩子的积极发展而付出的具体切实的支持性行动（如经常陪着孩子做他/她喜欢做的事情），后者指父母为孩子生理健康发展所做的点点滴滴（如精心安排好一日三餐）（王燕,张雷 2007）。众所周知，在留守情境下，父/母很难为孩子提供具体切实的帮助，也无法照顾他们的饮食起居，给予的物质关爱少；但他们并未完全成为孩子成长的旁观者，他们一般会通过电话、短信、视频聊天等方式与孩子进行互动与交流，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孩子对父母情感关爱的需求。基于这一情况，同时为便于与非留守儿童进行比较，范兴华（2012）将“父母给予儿童帮助、指导、鼓励、肯定以及与孩子沟通交流等发生的情况”定义为父母关爱，主要强调父母在心理和情感层面对孩子的关注和接纳程度。……

2.2 研究工具

在“2.2 研究工具”部分，“父母关爱问卷，共 8 题，要求被试报告最近一年内自己在总体上感觉到的父母给予帮助、鼓励、指导等情况发生的频率”，以测查儿童感知到的来自父母的情感关爱，5 点计分，1 为很少，5 为非常多。

意见 2：2.2 研究工具的友谊质量量表：“前、后测中外向性的 Cronbach α 系数分别为 0.82、0.79”中的“外向性”是什么？

回应：“外向性”一词是作者在录入文字时的误录，已更正为“该问卷”。

意见 3：3.2.1 中在报告间接效应的置信区间时，建议分别报告两条间接路径的置信区间。

回应：有关两条路径的置信区间的重新表述如下：从预测效应看，T1 父母关爱对 T1 抑郁的总效应为-0.38，其中直接效应-0.27，占总效应的 71%；间接效应-0.11，由 T1 自尊（ $-0.16 \times 0.33 = -0.05$ ）和 T1 神经质（ $-0.34 \times 0.18 = -0.06$ ）的中介效应构成，占总效应的 29%。Bootstrap 检验发现，T1 自尊、T1 神经质的中介效应 95%CI 为（-0.10, -0.001）、（-0.12, -0.002），均未包括 0，中介效应显著。说明父母关爱部分通过提升儿童自尊与情绪稳定性来减少抑郁发生。

此外，在以上修改基础上，还列出了“3.2.2 延时预测模型 M2 的检验”部分第一段图 3 模型中的 T2 自尊、T2 神经质的间接效应的 95% CI。相关表述如下：……，间接效应-0.12，占总效应 30%，由 T2 自尊（ $0.24 \times -0.29 = -0.07$ ）和 T2 神经质（ $-0.24 \times 0.19 = -0.05$ ）的中介效应组成，对应 95%CI 为（-0.13, -0.01）/（-0.09, -0.01），均未包括 0，故中介效应均显著。

意见 4：3.2.2 中“在图 4 初始模型的基础上增加控制了 T2 父母关爱对 T2 自尊、T2 神经质与 T2 抑郁的作用。”后“同时，T1 父母关爱对 T2 自尊与神经质的预测作用不显著，说明 T2 自尊与神经质对 T1 父母关爱与 T2 抑郁关系的直接中介作用消失；”。根据温忠麟、叶宝娟(2014)在《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和模型发展》一文中提出：当中介效应的两条路径中有一条不显著时，应该用 bootstrap 检验两条路径的系数乘积的置信区间是否包含 0。

回应：针对这一意见，我们依据“在图 4 初始模型的基础上增加控制了 T2 父母关爱对 T2 自尊、T2 神经质与 T2 抑郁的作用”这一描述对原始数据进行了重新分析，将“T1 父母关爱对 T2 自尊、T2 神经质的预测不显著，但 T2 自尊与 T2 神经质对 T2 抑郁的作用显著”中的相关路径系数予以补充，同时依据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关于“当中介效应的两条路径中有一条不显著时，应该用 bootstrap 检验两条路径的系数乘积的置信区间是否包含 0”的观点，对“T2 自尊、T2 神经质是否中介了 T1 父母关爱对 T2 抑郁的作用”进行了检验，并依据检验结果删除了“T1 父母关爱对 T2 自尊、T2 神经质的预测路径”。**修改后的表述如下：**

其次，在图 4 初始模型的基础上增加控制了 T2 父母关爱对 T2 自尊、T2 神经质与 T2 抑郁的作用。结果显示，模型的整体拟合指数较差($\chi^2/df=8.26$, NFI=0.59, IFI=0.62, CFI=0.60, RMSEA=0.220)，T1 友谊质量→T2 抑郁、T1 父母关爱×T1 友谊质量→T2 抑郁的预测系数均不显著，故删除这两条路径；同时，T1 父母关爱对 T2 自尊($\beta=0.04, p>0.05$)、T2 神经质($\beta=-0.09, p>0.05$)的预测不显著，但 T2 自尊($\beta=-0.26, p<0.001$)与 T2 神经质 ($\beta=0.15, p<0.05$)对 T2 抑郁的作用显著。根据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的观点，当中介效应的两条路径中有一条不显著时，应检验两路径系数之积的置信区间是否包含 0。Bootstrap 检验发现，T1 父母关爱→T2 自尊/T2 神经质→T2 抑郁这两条路径中，路径系数之积依次为-0.01、-0.01，对应的 95%CI 为(-0.04, 0.02)、(-0.04, 0.01)，均包含 0 在内，表明两者的中介效应均不显著，故删除 T1 父母关爱对 T2 自尊、T2 神经质的预测路径。在此基础上，增加 T1 父母关爱与 T2 父母关爱以及 T2 自尊与 T2 神经质间残差的相关，并重新进行数据拟合，模型的整体拟合指数变得可以接受($\chi^2/df=1.90$, NFI=0.90, IFI=0.95, CFI=0.95, RMSEA=0.077)。由图 5 可知，在同时控制性别与 T2 父母关爱的作用后，T1 父母关爱对 T2 抑郁的直接效应接近显著($\beta=-0.14, p<0.08$)，但与仅控制性别作用时相比($\beta=-0.28, p<0.001$)，预测能力明显降低；同时，T1 父母关爱不再直接影响 T2 自尊与 T2 神经质，即 T2 自尊与神经质对 T1 父母关爱与 T2 抑郁关系的直接中介作用消失；此外，T1 父母关爱×T1 友谊质量对 T2 自尊($\beta=0.15, p<0.05$)与 T2 神经质 ($\beta=-0.15, p<0.05$)的预测作用均显著，且与控制 T2 父母关爱作用前的预测能力基本相同、预测性质不变。

Wen, Z. L., Ye, B. J. (2014). Analyses of mediating effects: the development of methods and models.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2(5), 731-745.

[温忠麟,叶宝娟. (2014). 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和模型发展.心理科学进展, 22(5),731-745.]

意见 5：4.4 友谊质量、自尊与神经质对父母关爱与抑郁关系的调节：建议进一步斟酌对调节效应不显著的解释。

回应：针对这一意见，从以下三方面进行了修改：

一是将友谊质量调节作用的讨论从4.4中移到了4.5中。调整后，4.4部分标题改为“4.4 自尊与神经质对父母关爱与抑郁关系的调节作用”，4.5部分的标题改为“4.5 友谊质量对父母关爱与自尊、神经质、抑郁关系的调节作用”。这一调整使得讨论部分的内容与引言部分的内容建立起一一对应关系，文章的结构比原先更为严谨。

二是对“1.3自尊、神经质人格在父母关爱缺失与留守儿童抑郁间的调节作用”进行了少量修改，重点补充了有关神经质与压力生活事件交互作用不显著的研究结果。通过这一修改，对相关研究的回顾变得更加全面和清晰，也为此处4.4部分的讨论修改奠定了基础。

三是对4.4部分进行了重新写作。修改时，删除了先前讨论时所基于的理论---差别易感性模型，并基于以往相关文献，归纳出“自尊不能缓冲家庭生活压力和相依性压力对抑郁的预测效应，神经质则不能加重一般性的生活压力对抑郁的不利影响”的结论。最后，结合留守儿童的具体情况，对父母关爱缺失的来源、儿童对其感受程度及其相依性特点展开了论述，以此解释交互效应不显著的原因。以上三处修改后在文中的具体表述如下：

4.5 友谊质量对父母关爱与自尊、神经质、抑郁关系的调节作用

对 M₁ 模型的检验发现, 友谊质量对父母关爱→自尊/神经质/抑郁三条即时预测路径的调节效应均不显著; 同时, 对 M₂ 模型的检验结果显示, 友谊质量对父母关爱→抑郁的延时预测关系的调节作用无统计学意义。这可能与研究样本的特殊性有关。周宗奎等(2005)发现, 在大多数留守儿童看来, 社会、政府、学校等均不可能为他们提供太多有价值的帮助, 因为父母是不可替代的。也许, 正是“父母是不可替代的”这样一种相对稳定的认知图式, 影响着留守儿童对当下各类不同来源的社会支持的整体性认识和接纳, 即使是亲密的友谊关系也无力缓解父母关爱缺失对其人格适应的即时影响以及抑郁发展的长期不利。

1.3 自尊、神经质人格在父母关爱缺失与留守儿童抑郁间的调节作用

神经质是与抑郁体验密切相关的人格因子。……一些研究结果支持了该模型的观点, 例如, Vinkers 等(2014), ……神经质与慢性压力的交互项对抑郁症初始水平以及抑郁症变化均有显著正向预测效应。也有一些研究结果显示, 神经质对生活压力事件与抑郁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Spinhoven et al., 2010; Yang, Chiu, Soong, & Chen, 2008), 并未提供相关佐证。正如 Kushner (2015)所述, 在神经质与压力是否交互影响抑郁的问题上, 研究结果存在明显不一致现象, 一些结果证实了交互作用的存在, 一些结果则没有。据上可知, 作为一种典型的抑郁素质, 神经质会增加个体抑郁的整体风险, 但能否增加逆境中个体抑郁的易感性需视具体情况而论。

4.4 自尊与神经质对父母关爱与抑郁关系的调节

对 M₁ 模型和 M₂ 模型的检验结果显示, 自尊、神经质对父母关爱与抑郁关系的即时和延时调节作用均不显著, 假设 H₃ 未被证明, 表明素质压力理论框架下的自尊缓冲假说和阳性乘法模型未获支持。这与以往的一些研究结果一致(Orth et al., 2009; Moksnes et al., 2016), 同时与一些研究结果相左(Eisenbarth, 2012; 党清秀, 2016)。

已有相关研究结果明显不一致, 可能与各研究关注压力的不同层面有关。例如, Moksnes 等(2010)发现, 自尊能缓冲同伴压力对抑郁的不利影响, 却不能调节家庭生活压力对青少年抑郁的预测效应; Orth 等(2009)认为, 自尊可能仅对特定类型的生活压力事件有缓冲效应, 但不能调节相依性压力事件(dependent events)(指事件发生可受个体控制或影响, 如在重要考试中失败)对抑郁的影响; Yang 等 (2008)指出, 神经质对压力与抑郁关系的调节作用取决于压力对个体的影响: 不严重的压力事件对抑郁的消极效应与个体神经质水平无关。由此看来, 自尊不能缓冲家庭生活压力和相依性压力对抑郁的预测效应, 神经质则不能加重一般生活压力对抑郁的不利影响。

父母关爱缺失是一种源于家庭教养领域的日常生活压力, 儿童对其感受既不十分强烈(因表 2 显示, 单、双留守儿童的父母关爱得分均位于项目答案“一般多”区间的理论中数 3.00 与上限 3.50 之间), 也非完全不可改变。如前所述, 外出父母与留守子女一般会进行定期沟通, 必要时儿童也可以主动与外出父母取得联系, 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满足儿童对父母关爱的需求。不仅如此, 年龄稍大的儿童还能认识到父母外出务工对增强家庭教育投资能力和改善家人生活状况所具有的积极意义, 有助于儿童更好地诠释父母关爱的内涵。总之, 这种来自家庭内部的父母关爱缺失, 因其影响程度一般且具有相依性特点, 可能导致它与自尊、神经质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第三轮

审稿人 2 意见:

意见 1: 进一步理清变量之间关系及解释。在假设中提及“即时预测模型 (M₁): 控制性别的作用后, T1 父母关爱对 T1 抑郁有即时预测效应, 此关系受到 T1 自尊与 T1 神经质的中

介和调节……延时预测模型(M2): 控制性别对 T2 抑郁的作用后, T1 父母关爱对 T2 抑郁有延时预测效应, 其预测关系受到 T2 自尊、T2 神经质的中介和调节。”假设模型中的自尊和神经质同时是父母关爱和抑郁关系的中介和调节变量, 这里需要更加明确地阐述这种中介和调节共同作用的机制。同时也需要进一步明确, 结果部分只有自尊和神经质对父母关爱和抑郁之间关系的中介作用, 而没有调节作用进行报告。

回应: 此意见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关于自尊与神经质的中介和调节共同作用机制的问题, 我们在文章 1.3 部分的最后增加了一个段落, 对此进行专门论述。具体表述如下:

综合1.2和1.3可知, 父母关爱缺失对留守儿童自尊与神经质人格的发展均有消极影响; 自尊水平的降低和/或神经质水平的提高, 不仅会提升儿童的抑郁水平, 而且会增加儿童对外界负性信息的注意偏向, 导致儿童对留守生活中的一些不利情境(如中秋等传统节日时, 非留守儿童能与父母团聚, 留守儿童却缺少父/母的陪伴)更加敏感, 进而加重了父母关爱缺失对抑郁的影响。总之, 无论是自尊还是神经质人格, 都同时可能是父母关爱和留守儿童抑郁关系中的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

二是关于“结果部分只对中介作用而没有对调节作用进行报告”的问题。有关调节作用的报告在上次修改稿中的“3.2.1 即时预测模型 M1 的检验”和“3.2.2 延时预测模型 M2 的检验”中已有涉及, 但表述欠清晰。因此, 本次修改在相关段落末尾添加了与调节作用整体结果有关的表述。具体表述如下:

3.2.1 即时预测模型 M1 的检验 其次, 对 M1 模型中自尊与神经质对父母关爱→抑郁路径的调节作用进行检验。……这表明, 自尊与神经质对父母关爱与抑郁的即时关系的调节效应不存在。

3.2.2 延时预测模型 M2 的检验 最后, 对 M2 模型中 T2 自尊与 T2 神经质对 T1 父母关爱→T2 抑郁路径的调节作用进行检验。……这说明, T2 自尊与 T2 神经质均不能调节 T1 父母关爱对 T2 抑郁的延时预测作用。

意见 2: 需要加强该领域内一些国内外重要文献研读和结论的引用。有关亲子分离时间影响可阅读和参考: Liu, Z., Li, X., & Ge, X. (2009). Left too early: the effects of age at separation from parents on chinese rural children's symptoms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99(11), 20-49. 有关农村留守儿童抑郁文章国内已有多篇研究, 文中均未引用其结论。

回应: 此条意见涉及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有关亲子分离时间的影响。我们对审稿专家推荐的文献(Liu, Li, & Ge, 2009)进行了反复阅读, 并在“4.5 研究的意义、局限性及启示”中对研究结果进行了引用。具体表述如下: 亲子分离时的年龄(即分离年龄)越小, 留守儿童的抑郁水平就越高; 该效应在母亲外出儿童和双亲外出儿童中尤为明显, 且不受儿童年龄、性别及其地域的影响 (Liu, Li, & Ge, 2009)。

第二个问题是有关国内农村留守儿童抑郁研究成果的引用。针对该问题, 我们检索了“中国知网”数据库, 检索条件设定为: 摘要中包含“留守儿童”且“抑郁”; 词频“精确”; 来源类别为“CSSCI”; 时间为“不限”; 结果为18篇。在这18篇文献中, 原稿已引用4篇(范兴华, 方晓义, 陈锋菊, 2011; 侯珂, 刘艳, 屈智勇, 蒋索, 2014; 凌宇, 杨娟, 钟斌, 章晨晨, 姚树桥, 2009; 严虎, 陈晋东, 2013), 本次修改增加引用了2篇, 其余12篇因不能为修改稿增加新的信息而未被引用。增加引用的2条文献信息如下:

Fan, X. H. (2011). On the comparison of emotional adaptation between left-at-home rural children of various types and normal children. *Chinese Journal of Special Education*, (2), 71-77.

[范兴华.(2011).不同监护类型留守儿童与一般儿童情绪适应的比较. *中国特殊教育*, (2), 71-77.]

Xu, Z.J., Ci, Z.M., Jiang, Y.T., & Sui, W.T. (2016). The rate of depression symptom in left-behind

children: A meta-analysis of publications from 2000 to 2015. *Chinese Mental Health Journal*, 30(12), 923-928.

[徐志坚,慈志敏,姜岩涛,隋维涛.(2016). 留守儿童抑郁症状的检出率——2000-2015 年发表论文的 meta 分析.中国心理卫生杂志,30(12),923-928.]

其中,第一条文献的结果添加在问题提出部分第二段,即“留守儿童的抑郁得分(范兴华,2011)……显著高于非留守儿童”;第二条文献的结果添加在“4.5 研究的意义、局限性及启示”中,具体引用内容为:留守儿童抑郁症状检出率存在年龄差异,年龄越小,检出率越高(徐志坚,慈志敏,姜岩涛,隋维涛,2016)。

第四轮

编委复审意见:

意见 1: 作者针对审稿人的意见进行了多轮认真修改,文章质量有明显提升。不过目前文章篇幅过长,建议作者精简内容,文章字数控制在 1 万字以内,文献控制在 50 条以内。

举例:作者的英文摘要第一段:

During the past 20 years, there has been an unprecedented growth of economically driven rural-to-urban migration in China, which has been called the largest migration in human history. As a result, about 61.02 million children were left in the original rural communities by one or both of rural-to-urban migrant parents, and they were called left-behind rural children, who represented an important segment of the population directly influenced by this massive peasant migration in China.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a body of literature on left-behind children psycho-social adaptation is burgeoning. 这些内容显然无需出现在摘要中。

回应: 根据编委专家的复审意见,我们对原文进行了反复精简。精简时,我们遵循了以下几点:(1)不删除文章的研究内容,但对全文表述进行反复琢磨和精简,使之更加准确、简洁;(2)针对外审专家意见进行的历次修改,文中均应保留其主要思想;(3)对相同研究结果进行引证时,引用文献不超过两条(因增加文献不能增加相关信息);(4)图中或表中已有的数字,文字表述中不再重述;(5)为节省篇幅,参照学报近期发表的论文,仅报告了部分模型拟合指数(χ^2/df 、NFI、IFI、RMSEA);同时,被试信息、变量相关系数改用文字描述,而不用表格呈现。

根据上述思路,我们经过反复修改,将原文正文(不含中英文摘要,下同)字数 **21497** 个、文献 **106** 条共 **28** 个版面精简为正文字数 **10965** 个(字数略超编委复审意见要求,但此次修改将原文表 1 和表 3 改用文字表述,共节省的篇幅可容纳字数约 990 个,未能在正文字数统计中体现出来)、文献 **49** 条共 **15** 个版面。整体篇幅精简了近一半,非常接近编委复审意见关于文章篇幅的要求。

此次修改是一次全面的修改,涉及到文中的每一个字,甚至标点符号,难以全部标注,烦请专家阅读全文。以下仅呈现了本次修改幅度较大的五个地方。

一、第一处修改较大的地方

将原文“1.2 自尊、神经质人格在父母关爱缺失与留守儿童抑郁间的中介作用”与“1.3 自尊、神经质人格在父母关爱缺失与留守儿童抑郁间的调节作用”合并为“1.2 自尊、神经质人格对父母关爱缺失与抑郁关系的中介与调节”。合并的理由是基于以下假设:自尊与神经质人格都同时可能是父母关爱和留守儿童抑郁关系中的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我们认为,修改后的内容更加紧凑、简洁,对研究假设的论述更具有针对性,逻辑性比原来也更强。

(一)修改前的表述

1.2 自尊、神经质人格在父母关爱缺失与留守儿童抑郁间的中介作用

素质压力理论认为,压力通过激发素质来影响抑郁的发展。这意味着,父母关爱缺失对留守儿童抑郁的影响将通过某些素质的中介作用来实现。以往研究中,低自尊(Garber, Korelitz, & Samanez-Larkin, 2012)、神经质人格(Gonda, Fountoulakis, Juhasz, Rihmer, Lazary, Laszik, et al., 2009)作为抑郁素质备受关注。自尊是个体对自我的情感性评价,是自我的核心成分和人格特征中关于自我价值感的核心概念,影响着个体对周围环境的应对方式(Kernis, 2003)。高自尊个体倾向于对环境信息进行积极的加工,更多的表现为乐观、自信和期望成功;低自尊个体对人际交往、自我的负性情绪信息存在注意偏向,更多的体验到抑郁等消极情绪(Sowislo & Orth, 2013; 李海江,杨娟,贾磊,张庆林,2011)。神经质是一个与负性情绪体验有关的人格维度,它表现为情绪稳定性的差异;高神经质个体具有易情绪化、易焦虑、易冲动等特点,其自我图式较为消极,具有保持负性生活事件信息、同时贬低积极生活经验的倾向性,在生活压力事件面前容易遭受打击并产生沮丧等消极情绪;低神经质个体多表现为平静,不容易出现极端与不良的情绪反应(Robinson, Ode, Moeller, & Goetz, 2006)。可见,在压力情境下,低自尊与高神经质均使得个体对负性情绪信息较为敏感;而且,当它们一起对抑郁进行预测时,两者的主效应均显著(Roberts & Kendler, 1999)。这说明,低自尊与神经质是结构上既有关联又相对独立的两种抑郁素质。

从发展的角度看,自尊、神经质属于人格变量的范畴,亦可作为个体社会性发展结果的指标。自尊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青少年的自我理解,很可能是一个波动的动态结构,容易受到各种外部困难和内部困难的影响(Orth & Robins, 2014; Ramsawh, Ancoli-Israel, Sullivan, & Hitchcock, 2011)。神经质作为人格的核心成分之一,出现在童年晚期,随着年龄增长稳定性不断增加,成熟于成年期(Costa & McCrae, 1988; Lamb, Chuang, Wessels, Broberg, & Hwang, 2002);在此期间,童年逆境、慢性的人际生活压力等环境因素对其发展存在不利影响(Ramsawh et al., 2011; Uliaszek et al., 2010)。一些研究发现,父母养育方式中的父母关爱维度与大学生自尊呈显著正相关(曾晓强,2010)、与初中生神经质人格呈显著负相关(黄树香, 2010),童年期的父母关爱对成年期自尊有显著延时正向预测性(Engert et al., 2010)、神经质人格有显著延时负向预测性(Reti et al., 2002)。这些结果表明,父母关爱对儿童青少年自尊、神经质人格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且深远的积极影响,父母关爱缺失将对其发展构成威胁。

综上,低自尊与神经质人格作为两种不同的抑郁素质,对抑郁有即时预测性;父母关爱则对自尊与神经质人格既有即时影响也有延时影响。但这些研究探讨的是父母关爱、自尊/神经质、抑郁三者中的两两关系,对自尊/神经质在关爱与抑郁关系中的作用没有考察;而且,相关研究集中在普通的儿童青少年群体,缺乏对亲子长期分离的留守儿童群体的研究。基于上述研究结果及现状,同时依据变量的中介作用原理,提出假设 H₂: 在父母关爱对留守儿童抑郁的即时预测关系中,自尊与神经质起中介作用;延时预测关系中,后测自尊与神经质起中介作用。

1.3 自尊、神经质人格在父母关爱缺失与留守儿童抑郁间的调节作用

素质压力理论指出,人格、生理或基因方面的抑郁易感性不同,将导致个体在压力状态下体验到的抑郁情绪各异(Belsky & Pluess, 2009)。低自尊个体对抑郁的易感性较高,这将加重压力对其抑郁的不利影响。自尊的缓冲假说也指出(Orth, Robins, & Meier, 2009),压力事件普遍可以导致抑郁,面对挑战性的生活情境时,低自尊个体由于缺少足够的应对资源而容易遭受抑郁,高自尊者因拥有较好的应对资源故能有效缓解压力对心理健康的侵害。研究发现,自尊能有效缓冲总的生活压力对大学生抑郁(Eisenbarth, 2012)、低水平亲子关系对青少年抑郁(党清秀,李英,张宝山,2016)以及童年期的情感忽视对青少年期抑郁(凌宇,杨娟,钟斌,章晨晨,姚树桥,2009)的不利影响,从而支持了自尊的缓冲假说。但一些研究结果并未支持这一假说(Orth et al., 2009; Moksnes, Bradley Eilertsen, & Lazarewicz, 2016; 吴文峰,卢永彪,2012)。基于不一致的研究结果,有研究者认为,自尊可能仅仅对特定类型的压力生活事

件具有缓冲效应(Moksnes, Moljord, Espnes, & Byrne, 2010)。因此,对自尊是否调节父母关爱缺失这一特定压力对儿童抑郁的影响进行探讨,仍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神经质是与抑郁体验密切相关的人格因子。高水平的神经质使得个体对“压力生活事件导致抑郁”具有一种预定的倾向性 (Hammen, 2005)。用于评估疾病风险的阳性乘法模型 (the positive multiplicative model)认为,神经质与逆境(adversity)对疾病风险存在交互影响,随着神经质水平的提高,逆境对疾病风险的影响增加(Kendler, Kuhn, & Prescott, 2004)。一些研究结果支持了该模型的观点,例如, Vinkers 等(2014)以 2837 名 18-65 岁普通人群为被试的研究发现,神经质与累积压力(由童年期虐待、日常烦恼和生活压力事件三者的 Z 分数相加而成)的交互项对抑郁症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随着神经质水平的提高,累积压力对抑郁症的不利影响加大。再如, Brown 和 Rosellini (2011)以 826 名有情绪障碍的门诊病人为样本进行为期一年的追踪研究,结果表明,神经质与慢性压力的交互项对抑郁症初始水平以及抑郁症变化均有显著正向预测效应。也有一些研究结果显示,神经质对生活压力事件与抑郁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Spinhoven et al., 2010; Yang, Chiu, Soong, & Chen, 2008),并未为阳性乘法模型提供相关佐证。正如 Kushner (2015)所述,在神经质与压力是否交互影响抑郁的问题上,研究结果存在明显不一致现象,一些结果证实了交互作用的存在,一些结果则没有。据上可知,作为一种典型的抑郁素质,神经质会增加个体抑郁的整体风险,但能否增加逆境中个体抑郁的易感性需视具体情况而论。

父母关爱缺失是留守儿童必须面对的慢性生活压力之一,不同于以往研究中的压力。它对儿童抑郁的影响是否会受到自尊与神经质的调节?目前尚无直接的相关证据。但有研究显示,与非留守儿童相比,留守儿童的自尊较低、神经质水平较高的同时,其抑郁水平也较高(Liu et al., 2015; 兰燕灵等,2009)。这是否是因为较低的自尊和较高的神经质导致留守儿童对缺少父母呵护等消极环境信息较为敏感,进而加重了父母关爱缺失对抑郁的不利影响?基于自尊的缓冲假说和评估疾病风险的阳性乘法模型的观点,在H₁的基础上进一步假设H₃:在父母关爱对留守儿童抑郁的即时预测关系中,自尊起加强作用,神经质有减弱作用;延时预测关系中,后测自尊与神经质亦起调节作用。

综合1.2和1.3可知,父母关爱缺失对留守儿童自尊与神经质人格的发展均有消极影响;自尊水平的降低和/或神经质水平的提高,不仅会提升儿童的抑郁水平,而且会增加儿童对外界负性信息的注意偏向,导致儿童对留守生活中的一些不利情境(如中秋等传统节日时,非留守儿童能与父母团聚,留守儿童却缺少父/母的陪伴)更加敏感,进而加重了父母关爱缺失对抑郁的影响。总之,无论是自尊还是神经质人格,都同时可能是父母关爱和留守儿童抑郁关系中的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

(二) 修改后的表述

1.2 自尊、神经质人格对父母关爱缺失与抑郁关系的中介与调节

低自尊、高神经质作为抑郁素质备受关注。自尊是个体对自我的情感性评价,是自我的核心成分,影响个体对周围环境的应对方式:高自尊个体倾向于对环境信息进行积极加工,更多表现为乐观、自信和成功期望;低自尊个体对人际交往、自我的负性信息存在注意偏向,更多体验到抑郁等消极情绪(Sowislo & Orth, 2013)。神经质是与负性情绪体验有关的人格因子,表现为情绪稳定性的差异:高神经质个体易情绪化,自我图式较消极,有保持负性信息的倾向,遭受打击时容易产生沮丧等消极情绪;低神经质个体多表现为平静,不易出现不良情绪反应(Robinson, Ode, Moeller, & Goetz, 2006)。Roberts和Kendler(1999)发现,自尊和神经质一起对抑郁进行预测时,主效应均显著,表明两者是结构上既有关联又相对独立的素质。不仅如此,它们亦可作为社会性发展结果的指标。自尊反映了个体对自我的理解,是一个波动的动态结构,容易受到各种内外压力的影响(Ramsawh, Ancoli-Israel, Sullivan, & Hitchcock, 2011)。神经质是人格的核心成分之一,出现在童年晚期,随年龄增长稳定性增加,成熟于

成年期：在此期间，童年逆境、慢性生活压力对其发展有不利影响(Ramsawh et al., 2011; Uliaszek et al., 2010)。研究显示，自尊部分中介了父母关爱对大学生幸福感(曾晓强,2010)和童年期父母关爱对老年期压力反应(Engert et al., 2010)的影响；神经质部分中介了慢性生活压力对青少年抑郁(Uliaszek et al., 2010)和童年逆境对大学生睡眠质量(Ramsawh et al., 2011)的影响。总之，压力通过自尊与神经质的即时与延时中介进而对身心健康产生影响。

低自尊个体、高神经质个体的抑郁易感性较高，可能导致压力对其抑郁的影响加重。自尊的缓冲假说认为(Orth, Robins, & Meier, 2009)，压力情境下，低自尊个体由于缺少足够的应对资源而容易遭受抑郁，高自尊者因拥有较好的应对资源能有效缓解压力的不利影响。阳性乘法模型(the positive multiplicative model)指出，神经质与逆境对疾病风险存在交互影响，神经质水平越高，逆境对疾病风险的影响越大(Kendler, Kuhn, & Prescott, 2004)。研究发现，自尊可以缓解总的生活压力对大学生抑郁(Eisenbarth, 2012)、低水平亲子关系对青少年抑郁(党清秀,李英,张宝山,2016)的影响，但不能减弱压力事件数目(Orth et al., 2009)、不同领域的生活压力(Moksnes, Bradley Eilertsen, & Lazarewicz, 2016)对青少年抑郁的消极效应；神经质会加重累积压力对普通成人抑郁症(Vinkers et al.,2014)和慢性压力对门诊病人抑郁症初始水平以及抑郁症变化(Brown & Rosellini, 2011)的不利影响，但不能调节生活压力事件对青少年抑郁的作用(Yang, Chiu, Soong, & Chen, 2008)。这说明，低自尊和高神经质仅会加重某些特定压力对抑郁的影响。

父母关爱缺失是留守儿童必须面对的慢性生活压力，不同于以往研究中的压力。研究显示，与非留守儿童相比，留守儿童的自尊较低，神经质与抑郁水平均较高(Liu et al., 2015; 兰燕灵等,2009)。这是否是因为父母关爱缺失抑制了自尊与神经质人格的发展从而导致抑郁上升？抑或因为自尊降低与神经质水平提高，引发儿童对留守生活情境中的消极信息的注意偏向增加，进而加重了父母关爱缺失对抑郁的影响？基于以上论证，我们推断，这两种影响途径可能同时存在。具体假设如下：

H₂：在父母关爱对留守儿童抑郁的即时预测中，自尊与神经质既起中介作用同时起调节作用。调节作用中，自尊有加强效应，神经质有减弱效应。

H₃：在父母关爱对留守儿童抑郁的延时预测中，后测自尊与神经质既有中介效应同时又具调节效应。

二、第二处修改较大的地方

原文对“2.1 被试”中选取单、双、非三类留守儿童的论述过于具体和详细。修改后的内容更加简洁，同时保留了选取单、双、非三类留守儿童的理由，也符合专业杂志对被试取样的表述要求。

(一) 修改前的原文表述

2.1 被试

“父母一方或双方外出”是界定留守儿童的基本要素之一，据此可将留守儿童分为父亲外出、母亲外出和双亲外出三类(Wen & Lin, 2012; He et al., 2012)。目前，这三类儿童在留守儿童总体中各自所占的准确比例不详，但在留守儿童人数分别为3575人(姚计海,毛亚庆,2008)、1457人(侯珂等,2014)、4857人(Wang et al., 2015)的三项研究中，父亲外出和双亲外出两类儿童共占被试总数的比例依次为88.6%、94.7%和87.9%。就其抑郁发展而言，有研究发现，双亲外出儿童的抑郁得分显著高于父亲外出儿童(Zhao et al., 2015)；但也有研究表明两者差异不显著(范兴华,2012; Guo et al., 2015)。由此可知，留守儿童群体中，父亲外出儿童和双亲外出儿童占绝大多数，而且有关两者在抑郁发展差异方面的结果存在明显不一致现象。此外，以往研究在考察留守现象对儿童抑郁发展的影响时，常常将不同留守类型儿童设置为实验组、非留守儿童设置为对照组，在此基础上开展对比研究(范兴华,2012; Guo et al., 2015; 侯珂

等,2014)。但我们注意到,相关比较大多基于横断研究数据,难以揭示留守现象与儿童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

基于上述研究现状,我们选取相同生活背景下的非留守儿童为对照组,以父亲外出儿童(下称单留守儿童)、双亲外出儿童(下称双留守儿童)为实验组,采用追踪研究设计对其抑郁发展进行探讨,以期揭示留守现象对儿童抑郁发展的影响及其变化趋势,从而为农民工家庭选择“父亲外出”还是“双亲外出”的流动模式提供参考依据。

2009年10月,从湖南省某市(县)城郊、离市区约30公里、离市区约50公里的3个乡镇分别选取初中与小学各1所学校(共6所)作为调查学校,并以班为单位对四年级、七年级学生进行前测(T1),获得来自完整家庭的单留守儿童(仅父亲外出且由母亲监护)116名、双留守儿童(父母均外出且由祖辈监护)84名和非留守儿童(父母从未外出打工且由父母监护)79名,三类儿童共计279名。2012年5月(即2.5年后)进行追踪调查(T2),获得有效被试264名,其中前后测均为双留守儿童72人、单留守儿童79人、非留守儿童56人,其余57名被试的监护类型和/或留守类型在追踪期间发生了改变,故不参与分析。以追踪期内一直是双留守、单留守或非留守的三类儿童共207人作为分析对象,被试性别、学龄段以及留守类型的分布见表1。前测时被试年龄在8~14岁之间,平均 10.90 ± 1.58 岁。

表1 被试性别、学龄段与留守类型的分布(n,%)

	双留守	单留守	非留守	合计
男	36(50.0%)	47(59.5%)	27(48.2%)	110(53.1%)
女	36(50.0%)	32(40.5%)	29(51.8%)	97(46.9%)
四年级	31(43.1%)	28(35.4%)	26(46.4%)	85(41.1%)
七年级	41(56.9%)	51(64.6%)	30(53.6%)	122(58.9%)
合计	72	79	56	207

（二）修改后的表述

2.1 被试

根据父母外出情况,可将留守儿童分为父亲外出、双亲外出和母亲外出三类儿童,其中前两类儿童占绝大多数,且两者的抑郁得分差异是否显著尚无定论(侯 柯等, 2014; Zhao et al., 2015)。借鉴以往研究范式,以非留守儿童为对照组,以父亲外出儿童、双亲外出儿童为实验组开展追踪研究。2009年10月,从湖南省某市(县)3个乡镇分别选取初中与小学各1所作为取样学校,以班为单位对四年级、七年级学生进行前测(T1),获得来自完整家庭的父亲外出且由母亲监护的儿童(简称单留守)116名、双亲外出且由祖辈监护的儿童(简称双留守)84名和父母从未外出且由父母监护的儿童(简称非留守)79名,共279名。2012年5月进行追踪调查(T2),获得有效被试264名,其中57名被试监护类型和/或留守类型在追踪期间发生了改变而不参与分析。以前后测中一直处于相同留守状态的207名儿童为分析对象,其中双留守72人、单留守79人、非留守56人;男生110名,女生97名;四年级85人,七年级122人。前测时被试年龄在8~14岁之间,平均 10.90 ± 1.58 岁。

三、第三处修改较大的地方

对原文“2.4 统计处理”中的修改有两点:一是原文对初步统计分析的论述很具体,但原文3.1.2部分和3.1.3部分对此仍有论述,故此处仅需简要描述;二是原文对“同一变量在一个模型同时起中介和调节作用”的统计分析思路进行了分析,同时又从实际操作方面进行了具体描述,有重复之嫌。故修改时仅保留了对实际操作方面的具体阐述。修改后的内容更加精炼、简洁和清晰。

（一）修改前的原文表述

2.4 统计处理

采用SPSS16.0与AMOS22.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含初步统计分析 with 模型检验。初步统计分析包括：(1)采用验证性因素分析考察研究数据是否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2)采用MANOVA方差分析对单留守、双留守与非留守儿童在研究变量上的前测得分、后测得分分别进行比较；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对上述三类儿童在研究变量上的发展趋势进行考察；(3)采用Pearson相关考察留守儿童研究变量间的相关。模型检验时，采用协方差结构方程模型对即时预测模型M1、延时预测模型M2分别进行考察。由于M1与M2中均假定自尊与神经质在关爱与抑郁之间既起中介作用又起调节作用，而对于此类假设（即同一变量在一个模型中既起中介又起调节作用的假设），通常将两者分开进行检验。因此，对M1和M2的检验均包含两步：（1）检验自尊与神经质在父母关爱→抑郁路径中的中介作用以及友谊质量对父母关爱→抑郁、自尊与神经质三条路径的调节作用；（2）检验自尊、神经质对父母关爱→抑郁的调节作用。而且，对M2进行上述检验时，进一步区分了仅控制性别对T2抑郁的作用与同时控制性别对T2抑郁以及T2父母关爱对T2自尊、T2神经质与T2抑郁的作用这两种情况，以更清楚的考察父母关爱对抑郁的延时影响机制。

（二）修改后的表述

2.5 数据处理

采用SPSS16.0与AMOS22.0进行数据分析，含初步分析与模型检验。初步分析包括MANOVA方差分析、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和Pearson相关分析。模型检验含即时预测模型(M1)与延时预测模型(M2)检验，且均分两步：(1)检验自尊与神经质在关爱→抑郁间的中介作用以及友谊质量对父母关爱→抑郁/自尊/神经质路径的调节作用；(2)检验自尊、神经质对关爱→抑郁路径的调节作用。其中，M2检验又分为仅控制性别作用和同时控制性别与T2父母关爱的作用两种情况。

四、第四处修改较大的地方

参照心理学报最近发表的文章（郭海英，陈丽华，叶枝，潘瑾，林丹华.(2017).流动儿童同伴侵害的特点及与内化问题的循环作用关系：一项追踪研究.心理学报,49(3),336-348.），将原表3中与研究假设有关的所有相关系数改用文字表述，既大大节省了篇幅，也保持了文章的科学性。

（一）修改前的原文表述

3.1.3 留守儿童研究变量的相关分析

由于研究要考察的是父母关爱对留守儿童抑郁的影响机制，因此非留守儿童作为对照组不再参与分析。在此基础上，对不同留守类型（单留守 VS.双留守）、不同年级（四年级 VS.七年级）的留守儿童研究变量间的相关关系分别进行分析。Z 检验发现，单留守与双留守、四年级与七年级儿童在研究变量的即时相关系数和延时相关系数上的差异均不显著。因此，后续统计分析中，将不同留守类型、不同年级的留守儿童数据合在一起进行分析。留守儿童样本研究变量的积差相关系数见表3。

表 3 留守儿童研究变量间的积差相关系数

	性别	LT	GR	T11	T12	T13	T14	T15	T21	T22	T23	T24
留守时间 (LT)	-0.02											
学龄段(GR)	0.02	0.34**										
T1父母关爱(T11)	0.03	-0.24*	-0.21*									
T1自尊(T12)	-0.01	-0.24*	-0.03	0.38**								
T1神经质(T13)	0.00	0.22*	-0.02	-0.37**	-0.24**							
T1友谊质量(T14)	-0.17*	-0.09	0.10	0.23**	0.21*	-0.24**						
T1抑郁(T15)	0.26**	0.16	-0.07	-0.42**	-0.29**	0.33**	-0.37**					
T2父母关爱(T21)	0.05	-0.23*	-0.25**	0.61**	0.09	-0.06	0.21*	-0.30**				
T2自尊(T22)	-0.11	-0.15	-0.07	0.29**	0.32**	-0.17*	0.25**	-0.28**	0.34**			
T2神经质(T23)	-0.06	0.34**	0.20*	-0.28**	-0.07	0.26**	-0.18*	0.21**	-0.34**	-0.32**		
T2友谊质量(T24)	-0.37**	-0.02	0.00	0.18*	0.19*	-0.02	0.46**	-0.19*	0.25**	0.18*	-0.32**	
T2抑郁(T25)	0.18*	0.15	0.14	-0.45**	-0.17*	0.26**	-0.26**	0.47**	-0.58**	-0.47**	0.37**	-0.31**

注：性别编码：男=0，女=1；学龄段编码：小学=0，初中=1。

表 3 显示，从同时性角度看，无论在 T1 前测还是在 T2 后测中，父母关爱与自尊、友谊质量呈显著正相关，与神经质、抑郁呈显著负相关；自尊与抑郁呈显著负相关，神经质与抑郁呈显著正相关。从延时性角度看，T1 父母关爱与 T2 自尊、T2 友谊质量呈显著正相关，与 T2 神经质、T2 抑郁呈显著负相关；T1 友谊质量与 T2 抑郁呈显著负相关。此外，性别与 T1 抑郁、T2 抑郁的相关显著，留守时间、学龄段与 T1 抑郁、T2 抑郁的相关均不显著，故性别作为控制变量参与模型检验。

（二）修改后的表述

3.1.2 留守儿童研究变量的相关分析

非留守儿童作为对照组,不再参与后续分析。对单留守、双留守、四年级、七年级儿童研究变量的相关分别进行分析。Z 检验显示，单留守与双留守、四年级与七年级在变量的即时相关和延时相关系数上的差异均不显著。因此，将不同留守类型、学段的留守儿童数据合在一起分析。Pearson 相关分析发现，**从同时性角度看**，T1 前测/T2 后测中，父母关爱与友谊质量($r=0.23/0.25$)、自尊($r=0.38/0.34$)、神经质($r=-0.37/-0.34$)、抑郁($r=-0.42/-0.58$)，自尊与神经质($r=-0.24/-0.32$)、抑郁 ($r=-0.29/-0.47$) 以及神经质与抑郁($r=0.33/0.37$)的相关均显著($p<0.01$)；友谊质量与自尊 ($r=0.21/0.18$)、神经质($r=-0.24/-0.32$)、抑郁($r=-0.37/-0.31$)的相关亦显著($p<0.05$)。**从延时性角度看**，T1 父母关爱与 T2 父母关爱 ($r=0.61$)，T1 父母关爱/T1 友谊质量与 T2 自尊($r=0.29/0.25$)、T2 神经质($r=-0.28/-0.18$)、T2 抑郁 ($r=-0.45/-0.26$)的相关显著($p<0.05$)。此外，T1/T2 抑郁与性别(男=0,女=1)的相关显著($r=0.26/0.18$, $p<0.05$)，与留守时间、学段(小学=0, 初中=1)的相关不显著，故模型检验中仅控制性别的作用。

五、第五处修改较大的地方

原文对研究局限性从四方面进行了论述，篇幅较长。本次修改删除了第一方面局限性（关于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和第二方面局限性（关于追踪时间较长引发的无关变量问题）的相关论述，因为有关共同方法偏差问题的论证已在修改后的文中“2.4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部分进行了论述，不需赘述；同样，关于追踪时间较长引发的无关变量问题的论证已在修改后的“4.1 留守现象对儿童心理适应应有不利影响”部分对无关变量的控制已有论述。此外，对第四方面局限性“可能还有重要因素未被纳入研究”进行了精简，仅保留了对抑郁这一因变量有直接影

响的相关因素的论述。因为，无关变量的控制一般是针对研究的因变量而言的。

（一）修改前的原文表述

4.5 研究的意义、局限性及启示

研究亦存在四方面的局限性。一是使用问卷法收集数据，容易导致共同方法偏差问题；但依据 Harman 单因素检验法对样本数据进行检验，其结果表明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二是前测与后测的时间间隔为 2.5 年，时间跨度较长，儿童的认知能力、家庭抚养环境、同伴交往情况等都可能发生变化，进而对研究结果产生影响。为减少这一可能的影响，我们选取了 2.5 年内持续保持相同留守状态的儿童作为被试，控制了家庭结构、曾留守经历、实际监护人变更等无关变量的影响，同时在数据分析时使用统计方法控制或排除了性别、留守时间等变量的作用，以确保较高的研究内部效度。三是留守儿童被试共 151 人，含四年级 59 人、七年级 92 人，整体上样本量较少。样本量较少，所产生的相关矩阵不够稳定，使得结构方程分析结果的信度（可重复性）低，进而影响其效度。为此，Bentle 提出样本容量至少要有待估计参数数目的 5 倍以上(侯杰泰,温忠麟,成子娟,2004)。本研究涉及的所有模型中，图 5 的初始模型最为复杂，待估计的参数多达 17 个。按照 Bentle 的观点推算，图 5 模型的分析至少需要 85 名被试。据此可知，本研究的总样本量和七年级被试人数均可满足模型分析所需的最低样本容量要求，但四年级的样本量尚未达到这一标准。因此，扩大样本量有助于提高研究结果的信效度。四是可能还有重要因素未被纳入研究。虽然本研究考虑了留守时间对抑郁的影响，但有研究发现，留守儿童抑郁症状检出率存在年龄差异,年龄越小,检出率越高(徐志坚，慈志敏，姜岩涛，隋维涛，2016)；亲子分离时的年龄（即分离年龄）越小，留守儿童的抑郁水平就越高；该效应在母亲外出儿童和双亲外出儿童中尤为明显，且不受儿童年龄、性别及其地域的影响 (Liu, Li, & Ge, 2009)；分离年龄与留守时间交互影响着抑郁的发展：6 岁前与父母分离的儿童，留守时间对抑郁无明显影响；6 岁后分离的儿童，留守时间越长，抑郁水平越高(Ling, Fu, & Zhang, 2015)；外出父母与孩子的沟通越频繁、沟通话题越多(如学习体验、学校生活、感受等)，孩子的抑郁风险越低(Wang et al., 2015)；分离年龄越小、亲子联系越少，儿童的自尊水平越低(程黎,王寅梅,刘玉娟,2012)；分离年龄越小，儿童的神经质水平越高 (何资桥,2009)。后续研究中，若能将儿童年龄的主效应、分离年龄的主效应、分离年龄与留守时间的交互作用以及亲子沟通的作用予以控制，可能会进一步提高研究的内部效度。

（二）修改后的表述

4.5 研究的意义、局限性及启示

研究亦存在明显局限性。一是留守儿童被试共 151 人，被试量较少。按照 Bentle 的观点，样本量至少要有待估计参数数目的 5 倍以上才能确保研究的信效度。图 5 初始模型最为复杂，待估计参数 17 个，至少需要 85 名被试，超过四年级样本量。因此，扩大样本量有助于提高研究结果的信效度。二是一些重要因素未被纳入。研究显示，亲子分离时年龄越小，儿童的抑郁水平越高 (Liu, Li, & Ge, 2009)；6 岁前与父母分离的儿童，留守时间对抑郁无明显影响；6 岁后分离的儿童，留守时间越长，抑郁水平越高(Ling, Fu, & Zhang, 2015)；外出父母与孩子的沟通越频繁、沟通话题越多，孩子的抑郁风险越低(Wang et al., 2015)。后续研究中，若能将分离年龄的主效应、分离年龄与留守时间的交互效应以及亲子沟通的作用予以控制，可能会进一步提高研究的内部效度。

第五轮

主编终审意见：本研究采用父母关爱问卷、自尊量表、神经质人格问卷、友谊质量问卷和抑郁量表，对四年级和七年级的农村儿童进行一项为期 2.5 年追踪调查，借助抑郁素质压力的

理论框架,着重探讨了父母关爱与留守儿童抑郁之间的关系,并分析了自尊和神经质人格在其中的中介作用,以及友谊质量的调节作用。文章内容丰富详实,文献回顾较为完整,逻辑框架比较清晰,研究成果具有实践意义。作者已就前几位审稿人的意见进行了认真的回复和修正,文章质量已有较大提升,建议在以下几处做小的修正后发表:

意见 1: 本文的框架借助了抑郁的素质压力理论,认为抑郁的发生受到压力和素质的共同影响,一方面,压力可以激发素质,使得患病的潜在倾向变为了现实(中介作用);另一方面 素质还可调节压力对抑郁的影响,随素质水平的提高,压力对抑郁的影响增大(调节作用)。建议作者在具体描述父母关爱缺失(压力)对留守儿童抑郁的作用,以及自尊、神经质(素质)、同伴关系对该过程的影响时,能够更紧密地结合上文所提到的素质压力模型,形成对应关系,易于读者理解。

回应: 我们对该意见的理解是:(1)解释为何选取父母关爱缺失作为压力?这种压力对留守儿童抑郁情绪有何影响?(2)为何选取自尊、神经质和同伴友谊作为影响这个过程的素质变量?它们又是如何作用于这个过程的?根据上述理解,对原文第二段的相关表述进行了修改,并基于素质压力理论的观点,对缺少父母关爱、抑郁、自尊、神经质、友谊质量的关系进行了初步建构。此外,为更好地回应“形成对应关系,易于读者理解”的要求,我们在综述各部分的相关段落以及讨论部分的第一段中,对素质压力理论的主要观点进行了简要重述,以增强文章的整体感和可读性。具体修改情况如下:

1.1 原文第二段的相关表述

抑郁是儿童心理健康的一个重要指标,是一种感到无力应对外界压力而产生的消极情绪。研究发现,留守儿童的抑郁得分显著高于非留守儿童(侯珂,刘艳,屈智勇,蒋索,2014; Liu, Li, Chen, & Qu, 2015)。抑郁的素质压力理论(diathesis-stress theory) (Monroe, & Simons, 1991)认为,抑郁发生受到压力和素质的共同影响,其中,压力泛指重大生活事件、生活中的不利变化以及不利的早期发展经历等;素质指易患抑郁的个体特征,包括生物易感素质和心理易感素质。一方面,压力激发了素质,素质使得患病的潜在倾向变为了现实;另一方面,素质调节着压力对抑郁的影响,随着素质水平的提高,压力对抑郁的影响增大。而且,压力还会引发个体对支持资源的需求,低社会支持将增加个体对抑郁的易感性(Auerbach, Bigda-Peyton, Eberhart, Webb, & Ho, 2011)。就留守儿童而言,生活中缺少了父/母的陪伴和帮助,很多事情需要独立面对,使其基本需求得不到满足,容易产生委屈、无助等抑郁情绪;也使得他们比较在意别人的看法、对自己没有信心,敏感与自卑是其代表性的性格特点(刘霞,赵景欣,申继亮,2007)。为了缓解父母不在身边带来的不利,他们常常会找朋友玩耍、聊天、谈心等(范兴华,2012)。以敏感、自卑为特点的神经质人格、低自尊以及以玩耍、聊天、谈心为活动内容的同伴友谊,在父母关爱缺失与抑郁关系中扮演了何种角色?素质压力理论为此探究提供了理论框架。

1.2 修改后的第二段表述

抑郁是儿童心理健康的一个重要指标,是一种感到无力应对外界压力而产生的消极情绪。研究发现,留守儿童的抑郁得分显著高于非留守儿童(侯珂,刘艳,屈智勇,蒋索,2014; Liu, Li, Chen, & Qu, 2015)。抑郁的素质压力理论(diathesis-stress theory) (Monroe, & Simons, 1991)认为,抑郁发生受到压力和素质的共同影响,两者缺一不可。其中,压力泛指重大生活事件、生活中的不利变化以及不利的早期发展经历等;素质指易患抑郁的个体特征,包括生物易感素质和心理易感素质。一方面,压力激发了素质,素质使得患病的潜在倾向变为了现实,即压力通过素质的中介来影响抑郁发生;另一方面,素质调节着压力对抑郁的影响程度,随着素质水平的提高,压力对抑郁的影响增大。而且,压力还会引发个体对支持资源的需求,低社会支持将增加个体对抑郁的易感性(Auerbach, Bigda-Peyton, Eberhart, Webb, & Ho, 2011),积极的友谊关系则有助于个体对压力的适应(Zhao, Liu, & Wang, 2015)。就留守儿童而言,父

母外出后，他们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缺少了父母的关爱，一些基本需求得不到满足，相当多的儿童由此变得敏感和自卑，不仅比较在意别人的看法，而且对自己失去了信心，并常常伴随有委屈、无助、忧虑等抑郁情绪体验(周宗奎,孙晓军,刘亚,周东明,2005; 刘霞,赵景欣,申继亮,2007); 为了缓解父母关爱缺失给自身成长带来的不利,他们常常会去找朋友玩耍、聊天、谈心等(范兴华, 2012)。上述现象中,缺少父母关爱这一不利的抚养经历(压力)与留守儿童抑郁情绪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如果存在,以敏感、自卑为主要特点的神经质人格、低自尊在此关系中是否扮演了素质的角色? 它们所起的作用是中介还是调节抑或两者兼而有之? 同时,以谈心等为活动内容的同伴友谊能否有效缓解父母关爱缺失带来的不利? 素质压力理论为此探究提供了理论框架。

2 对文章其他部分所做的小修

(1) 在“1.1 父母关爱缺失与留守儿童抑郁情绪”部分中

第一段开头增加“压力是抑郁的诱因”这句话,然后接着论述“Hobfoll(2001)认为,压力是……”。

第二段开头增加“父母关爱缺失压力能否诱发儿童的抑郁情绪?”,然后接着论述“研究发现,……”。

(2) 在“1.2 自尊、神经质人格对父母关爱缺失与抑郁关系的中介与调节”部分中

第一段开头增加“压力通过激发素质来影响抑郁的发展”这句话,然后接着论述“以往研究中,……”。

第二段开头增加“素质调节着压力对抑郁的影响程度”这句话,然后接着论述“低自尊个体、高神经质个体的抑郁易感性较高,可能导致压力对其抑郁的影响加重……”。

(3) 在“1.3 友谊质量对父母关爱缺失与抑郁、自尊、神经质关系的调节”部分中

第一段开头增加“积极的友谊关系有助于个体对压力的适应”。然后,接着论述“同伴友谊作为儿童的重要社会支持资源,……”。

(4) “4 讨论”部分的第一段

(a)原文表述为:人类发展的生态系统理论指出,家庭环境变化将给儿童发展带来挑战;面对挑战,家庭环境、个体特征与同伴关系交互影响着儿童的适应。本文以留守儿童为被试,以源自家庭的父母关爱为预测变量,以自尊与神经质人格为中介与调节变量,以同伴友谊质量为调节变量,考察了它们对抑郁的交互影响。

(b)修改后的表述为:人类发展的生态系统理论指出,家庭环境变化将给儿童发展带来挑战;面对挑战,家庭环境、个体特征与同伴关系交互影响着儿童的适应。本文借助抑郁的素质压力理论框架,以留守儿童为被试,以源自家庭抚养的父母关爱为预测变量,以自尊与神经质人格两个个体特征变量为中介与调节变量,以友谊质量这一同伴关系指标为调节变量,考察了它们对抑郁的交互影响。

意见 2: 作者在方差分析中发现,双留守的 T2 抑郁显著高于 T1 抑郁,尽管作者未发现单留守与双留守在变量的即时相关和延时相关系数上的差异,将其在后续分析中合并处理,建议对双留守儿童 T2 抑郁分数增加的现象做进一步的分析和解释。

回应: 针对这一意见,我们紧紧抓住“压力是抑郁发生的诱因”的素质压力理论观点,从三个角度进行修改:(1) 首先,基于横断比较结果(单、双留守的父母关爱得分在前后测中均显著低于非留守,抑郁得分均显著高于非留守),从素质压力理论的观点出发,讨论了缺少父母关爱对留守儿童抑郁的影响;(2) 其次,阐述了双留守与单留守在留守处境方面存在的差异,即双留守需要面对的一些特定压力因素;(3) 最后,总结了双留守需要面对的普遍压力(父母关爱缺失,整个留守儿童群体需要面对的压力)与特定压力(与单留守相比,仅双留守需要面对的压力,如同伴欺负等),同时指出了他们在追踪期间恰逢青春期时需要面对

的身心适应问题（特定时期的正常发展问题），上述压力汇聚在一起可能是导致抑郁增加的原因。具体修改情况如下：

1 修改前的原文表述

4.1 留守现象对儿童心理适应有不利影响

从横向比较看，与非留守相比，单、双留守在前后测中报告的父母关爱均较少、抑郁均较多，表明留守儿童的心理适应状况较差，与范兴华(2012)、Liu等(2015)的结果一致。从纵向发展看，双留守后测抑郁显著高于前测，提示留守现象对抑郁发展有不利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双留守儿童不仅要承受亲子长期分离带来的烦恼，还要独自面对青春期特定的身心适应问题以及学习等方面的压力，容易使他们感到无所适从甚至无力应对，从而导致抑郁增加。

2 修改后的表述

4.1 留守现象对儿童心理适应有不利影响

比较发现，与非留守相比，单、双留守前后测中报告的父母关爱得分均显著较低、抑郁得分均显著较高，表明留守儿童的抑郁情绪相对严重，且缺少父母关爱可能是其重要诱因。这与素质压力理论关于“压力是抑郁的诱因”的观点一致。究其原因，缺少父母关爱不仅会导致儿童的亲情需要、陪伴需要、支持需要等得不到满足，而且会引发周围人的歧视与欺负等(张磊,傅王倩,王达,暴占光,2015)，使之体验到的抑郁较多。研究还发现，单、双留守在变量的即时和延时相关系数上的差异均不显著，表明缺少父母关爱等变量对两类儿童抑郁的影响模式趋于一致；但双留守后测抑郁显著高于前测，抑郁随留守时间增加，说明除缺少父母关爱等研究变量外，还有其它压力与素质助推了双留守抑郁的不利发展。有研究显示，与单留守相比，双留守报告的同伴欺负更多(傅王倩,张磊,王达,2016)、家庭气氛更冷清、监护人的学习管理能力更差(范兴华,简晶萍,陈锋菊,于梦娇,周妍,谌俏, 2018)、对留守烦恼的消极评价更高(赵景欣,申继亮,2011)，且上述变量对抑郁均有正向预测性(Li, & Kong, 2016; 范兴华等,2018; 赵景欣等,2011)。换言之，双留守除了要面对单留守也需面对的父母关爱缺失压力外，还需面对同伴欺负等多重压力。它们与青春期特定的身心适应问题汇聚在一起，容易使双留守感到无所适从甚至无力应对，从而导致抑郁增加。

Fan, X.H., Jian, J.P., Chen, F.J., Yu, M.J., Zhou, Y., & Chen, Q. (2018).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adversity and psychological adaptation among the left-behind rural children: psychological capital as a mediator. *Chines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26(1), 76-80.

[范兴华,简晶萍,陈锋菊,于梦娇,周妍,谌俏.(2018). 家庭处境不利与留守儿童心理适应: 心理资本的中介.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6(2), 206-211.]

Fu, W.Q., Zhang, L., & Wang, D. (2016). The discrimination perceived by left-at-home lower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in rural areas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ir problem behaviors: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ocial support. *Chinese Journal of Special Education (Monthly)*, (1), 42-47.

[傅王倩,张磊,王达.(2016).初中留守儿童歧视视觉及其与问题行为的关系: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 *中国特殊教育*, (1),42-47.]

Li, Y.J., & Kong, Y.R. (2016). The impact of victimization on depression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elf-esteem. *Advances in Psychology*, 6(8), 875-883.

Zhao, J.X., & Shen, J.L. (2011). Relationship between cognitive appraisals for left-home hassles, depression and loneliness in rural left-home-children. *Chines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19(4), 515-517.

[赵景欣,申继亮.(2011).留守烦恼的认知评价与农村留守儿童的抑郁、孤独.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19(4), 515-517.]

意见 3: 在延时预测模型 M2 中，作者发现随着友谊质量的提高，父母关爱对自尊/神经质的

延时影响增大,自尊/神经质的延时中介效应随之增强,作者对此的解释是“同伴接纳度高的儿童有较强的社交能力和丰富的情感体验,能在同伴交往过程中学会理解和感知他人的关爱,故友谊质量能促进儿童对父母关爱的感知,进而有助于儿童自尊和神经质人格的健康发展以及抑郁情绪的消解”。建议作者再斟酌这一解释的表述方式,友谊质量调节的是 T1 父母关爱→T2 自尊/神经质之间的影响强度,并不一定说明了友谊质量可以促进儿童对父母关爱的感知。

回应:针对这一意见,我们综合了与此有关的本文结果,即“友谊质量对父母关爱与自尊/神经质关系没有即时调节作用但有延时调节效应”。因此,修改时,首先对为何没有即时的增强作用的相关解释进行了补充;其次,解释了为什么有延时的增强作用。具体修改情况如下:

1 修改前的相关表述

4.4 友谊质量对父母关爱与自尊、神经质、抑郁关系的调节作用

友谊质量对父母关爱→自尊/神经质/抑郁的即时路径和对父母关爱→抑郁的延时路径的调节作用均不显著。周宗奎、孙晓军、刘亚和周东明(2005)发现,大多数留守儿童认为,政府、学校、他人等均不可能提供太多有价值的帮助,因为父母是不可替代的。这一认知图式整体上影响了他们对各类社会支持的接纳,故调节效应不显著。但有趣的是,T1 关爱×T1 友谊→T2 自尊/神经质的路径均显著,随着友谊质量提高,父母关爱对自尊/神经质的延时影响增大,自尊/神经质的延时中介效应也随之增强,且调节效应仅发生在初中儿童中。这可能是因为,同伴接纳度高的儿童有较强的社交能力和丰富的情感体验,能在同伴交往过程中学会理解和感知他人的关爱,故友谊质量能促进儿童对父母关爱的感知,进而有助于儿童自尊和神经质人格的健康发展以及抑郁情绪的消解。但从思维的发展趋势看,初中儿童的抽象性逻辑思维较小学儿童更为成熟,能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父母关爱的本质。从小学到初中,留守儿童中“认为父母外出主要是为了持家和供自己成长”的人数比例随年级升高而增加(周宗奎等,2005)。这也许是调节效应仅发生在初中留守儿童中的原因。

2 修改后的表述

友谊质量对父母关爱→自尊/神经质/抑郁的即时路径和对父母关爱→抑郁的延时路径的调节作用均不显著。亲子关系与友谊关系是儿童青少年的两种主要亲密关系,对其适应均有促进作用;但与友谊支持相比,父母支持是早期青少年情绪适应问题的最好预测指标(Helsen, Vollebergh, & Meeus, 2000)。而且,在大多数留守儿童看来,政府、学校、他人等均不可能提供太多有价值的帮助,因为父母是不可替代的(周宗奎等, 2005)。这一认知图式整体上影响了他们对各类社会支持的接纳,故友谊质量的调节效应不显著。但有趣的是,T1 关爱×T1 友谊→T2 自尊/神经质的路径均显著,随着友谊质量提高,父母关爱对自尊/神经质的延时影响增大。社会支持理论(social provisional theory)指出,父母和同伴是影响儿童青少年发展的两种重要支持来源,当一种关系质量较差时,另一种关系就会变得更为重要(Furman & Buhrmester,1985)。尽管父母具有不可替代性,但是随着留守时间的延长,儿童慢慢适应了缺少父母关爱的生活,他们常常会通过友伴活动来转移注意力和消解烦恼(范兴华, 2012)。而且,友谊质量与移情能力(Chow, Ruhl, & Buhrmester, 2013)、人际感恩水平(Cohen, 2012)均呈显著正相关。这意味着,友谊质量较高的留守儿童,对父母关爱的感知能力较强、感恩水平也较高,有助于形成积极的自我心理表征。从长远观点看,这将促进儿童自尊和情绪稳定性的健康发展。因此,随着友谊质量提升,父母关爱对自尊与神经质人格的延时影响增大。此外,友谊质量的延时调节效应仅发生在初中儿童中。究其原因,可能与儿童的思维发展趋势有关。初中儿童的抽象性逻辑思维较小学儿童更为成熟,能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父母关爱的本质。从小学到初中,留守儿童中“认为父母外出主要是为了持家和供自己成长”的人数比例随年级升高而增加(周宗奎等,2005)。

- Chow, C.M., Ruhl, H., & Buhrmester, D. (2013). The mediating role of interpersonal competence between adolescents' empathy and friendship quality: a dyadic approach. *Journal of Adolescence*, 36(1), 191–200.
- Cohen, A. D. (2012). *Does gratitude promote reciprocity in response to all benefits, or just those rendered by novel relationship partners? Testing the role of gratitude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reciprocal relationship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iami.
- Furman, W., & Buhrmester, D. (1985). Children's perceptions of the personal relationships in their social network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1, 1016–1024.
- Helsen, M., Vollebergh, W., & Meeus, W. (2000). Social support from parents and friends and emotional problems in adolescence.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29(3), 319–335.

-----完-----